

阎锡山与共产党在山西农村的较力

——侧重于抗战爆发前后双方在晋东南关系变动的考察

杨奎松

内容提要 阎锡山和中共都高度重视农村问题,阎能在山西独立经营 20 年之久,或与其在农村改造问题上的用心有关。但是,阎锡山的统治,仍是建立在传统社会结构基础上,因此,其抵御共产革命的最有效方式,其实是不允许中共在山西公开合法活动。抗战爆发,中共得以明暗两种方式进入山西,公开合法地介入到基层农村民众动员、组织和武装工作中去,自然引发了与传统旧派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无论从任何角度,中共这时都需要争取阎锡山能够在新旧势力,包括在国共关系中保持中立。因此,它并不曾主动地采取过破坏与阎统战关系的政策、行动,并且还不止一次地尝试着修补双方关系。然而,由于观念意识、经验情感、不同层级人员对政策策略的理解不同,特别是妥协合作出发点不同,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双方关系终究还是一步步地走向了破裂。

关键词 阎锡山 中共中央 统战 薄一波 晋东南

阎锡山,向有“山西王”之称。其能得此称谓,实因其曾对山西控制有术。自 1917 年得统摄山西省军政大权后,阎曾独立经营山西近 20 年之久,直至抗战爆发,他被迫允许外部势力进入山西。表面上,阎是因日本人入侵而不得不放手让中央势力和共产党进入山西,共同抗日,实际上还在日本入侵之前的 1935 年,他就已经对陕北红军的发展感到极度恐惧了。1936 年春,中共红军还曾一度攻入山西,阎锡山当时就不得不请国民党中央军入晋助“剿”,暂时得以解困。但由此亦不难看出,阎的“山西王”,多少有点名不符实。中共真能进据山西,阎锡山靠自己的力量要想把中共赶出山西,几乎没有可能。经过八年抗战后,阎锡山曾借助日本军队,并请国民党中央军帮忙,都没有能够把中共赶走,最后自己还被赶去了台湾。

中共打天下,走的是农村路线。阎锡山最早看出中共可怕,正是因为他意识到山西农村危机之不可解,知道中共一旦进入山西,旧有统治基础难免会根本动摇。阎锡山一贯重视社会改良,长于未雨绸缪。用中共之术,抢在中共前面,给农民以利益,将农民动员并组织起来,是他在日本入侵前就已开始试行的抑共之法。

用共产党的办法,来防共产党,这是阎锡山极为大胆的一种尝试。但他没有想到,借助中共的口号和做法,对他向所依赖的旧有统治秩序实为毒药。这不仅会破坏传统社会结构,他用来推行新

政策、实行新方法的新机构、新组织、新人员,注定也会与旧制度、旧组织、旧人员冲突不断。而且,要想用共产党的那套口号和方法,非得借重共产党的人才不可。杨虎城等地方实力派虽然大都有过成功利用前共产党人的经验,但一来这些人确实已经与中共脱离了关系,二来他们从未尝试过用共产党的政策、方法,另立门户与组织。阎锡山显然并不清楚他所笼络的前共产党人的真实情况,在抗战爆发,共产党及其军队大批进到山西来的情况下,放手让前共产党人来创建新政、新军,阎锡山最终对迅速壮大起来的新派势力失去控制,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需要说明的是,阎、共关系的历史,并不纯粹是一种政治史,需要更宽广的历史视野和多方面历史研究的关照。在这方面,既有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有关山西近现代史的研究,包括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亦或从中共党史的角度取得的研究成果,也包括对阎锡山生平、思想、活动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只是,涉及阎锡山与中共关系的历史解读,还明显存在着概念化和政治化的倾向。能够结合阎、共两方,并努力结合国民党方面的视角与史料,尽可能多地注意到当时历史发生、发展的复杂性的研究,目前还较少见到。特别是大陆方面涉及这一关系问题的研究,较多地还是单纯站在中共党史的视角在做解读,一些重要史实的重建还会因一些当事人话语权较强,其他当事人话语权较弱,存在着不全面,甚至不准确的情况。^① 围绕着阎、共关系变动,包括中共相关组织、人事及其政策策略变动的一些基本史实的研究讨论,自然也开展得十分不够。^②

本文试图就阎锡山与共产党关系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情况,做一较系统的考察,借以对导致双方关系破裂的复杂因素及其后果,做出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解读。

战前阎锡山的村政改革及其效果

(一) 阎锡山改革农村的最初尝试

在近代中国地方统治者中,大概没有谁比阎锡山更重视农村和农民问题了。

阎锡山 1883 年生人,1900 年家道中落,1902 年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 年留学日本,1909 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归国。他留学之际,日本“正值明治维新收效,凡政治社会一片振兴气象”^③,不仅打败中国,夺占朝鲜、台湾,而且战胜强俄,跻身世界几大列强行列。与大批中国青年蜂拥而至,通过日本学习西学不同,一心希望军事救国的阎锡山最为叹服的是日本的军国民教育和组织。受此影响,阎锡山深信,当此弱肉强食的时代,一方人民非“为一战争之团体”,必不能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和维护自身的安宁幸福。而要想使一方人民结成战争之团体,则非学日本整合“军国民社会”之法,将一户一人之一举一动“胥归摄制之中”。^④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山西人口 95% 以上都是农民。因此,自成为事实上的“山西王”以来,阎锡山就一心想要引用日本人的经验,设法把山西境内散漫的农民置于严密的组织之中。据此,阎锡山一方面力推现代化,以改变省内落后状况,加速提升全省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则着手城乡政制改革,建立从省到县到村的组织网络,使全省权力关系由省到村一体化。1917、1918 年,取得

^① 这方面当事人回忆录最多,对史实重建及其研究影响最多也最大的,无疑是薄一波在改革开放后出版的各种著述,如《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版)、《领袖元帅与战友》(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薄一波论新军》(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年版)等。

^② 张冠军的《牺盟会与共产党及阎锡山政权关系之辨误》(《晋阳学刊》2005 年第 4 期)一文,是笔者所见到的少有的注意到应该对这方面不准确的传统说法加以辨正的讨论文章。

^③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 1 卷,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25—26 页。

^④ 阎伯川:《军国主义译》(1915 年),转见中共中央党校本书编写组《阎锡山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3—24 页。

了军政大权的阎锡山先后推出所谓“六政三事”的新政,在全省范围一面推行天足、剪发和禁烟,一面大力推进水利、种树蚕桑、种棉、造林和牲畜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他从1917年到1922年接连颁布了《各县村治简章》《村编制现行条例》《县地方设区暂行条例》和《改进村治条例》等一系列村制实施条例及办法,设置了两套相互交叉重叠的管理机构。一套是常规的省、县、村的行政权力关系系统,在县、村之间加设区一级,以解决“因一县区域辽阔,县署实施监督势难周全”之缺^①;一套是用于实现“好人政治”的村政工作系统,着眼于村民的教化、组织与训练。

为健全金字塔式的由上至下贯通的权力网络,省政府增设有村政处,村政处下设考核股等,考核股等下设考察区,每区管八九个县,区下再设若干小段;小段主任分别由区长、县承政员、承审员、主计员、实业技士、视学员、宣讲员、警佐、巡官等兼任。小段主任可以直接管到村、闾、邻,甚至每一户。同时,每县加派整理村范员一名,直接到村协助监督考察“村范”。

为规范村的管理,阎锡山参照日本的町村制,并结合中国古制,以300户左右定为一编村,设村公所为办事机关。村内每25户编为一闾,设闾长;闾下5户编为一邻,设邻长。他宣称:非如此不能实现民治。因为“村是人类第一具有政治性的天然团体”,“村制是政治的起点”,亦是政治之根本。“欲期政治得良好之结果,须先从作极密之政治网起。鄙人现在亟亟于编村制,意欲由先使行政网不漏一村入手;一村不能漏,然后再做到不漏一家;由一家而一人,网能密到此处,方有政治之可言。”^②

阎锡山的目的,是要把全省农民全都有效地组织起来,依照他所认定的“是非曲直”做“好人”。因此,建立“极密之政治网”,不仅是要管住、管好农民,而且还要依照“好人”的规范来把农民教化好,训练好,亦即要全面实现所谓“村范”。因此,他除把行政权力层层编织到村到户以外,还下令设“村民会议”,订“村禁约”,立“息讼会”,编“保卫团”,并颁布《山西村政纲要》及《人民须知》《家庭须知》等“是非曲直”的行为规范及道德标准,由上到下全面“整理村范”。为此,各区、县均派人挨家挨户做调查,以查出各村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将政府规定的“危害人群”的十种“坏人”,即有聚赌、窝娼、贩毒、盗窃、斗殴或不孝行为者,全部登记在册。再由“公道而有良心”的“好人”加以劝导和管教;凡屡教不改者,即列为“莠民”,送入各县专门用于关押“坏人”的“新工厂”,劳动改造。^③

与当年兵燹遍地、土匪猖獗的中国内陆各省区相比,阎锡山此举确曾在社会治安上发生过较明显的效果。据说,1924年整个山西省总共只发生过劫盗案17件。也难怪梁漱溟到山西考察村政建设后,曾公开肯定山西村制改革的业绩,称:现在全国到处都乱象横生,堂堂所谓中央政府,简直毫无办法。“别的地方,如广西、广东、湖南、四川、陕西……哪处不是民不聊生!连我们最低要求的生命安全还保不住,还讲什么别的权利!”比较而言,“山西这方面,无论如何,我们总可以赞美地方政府有一种维持治安的功劳”。^④

(二) 实施“村本政治”的两面影响

“六政三事”以及“村治”“村范”等农村新政的推行,固然曾经起过一定作用,但是,此种所谓“村本政治”,并不能改变旧有的统治格局,反而因其把基层行政化,还极易诱发权力贪腐,并加剧农村原本就已经存在的贫富分化现象。

^① 参见《近现代山西政权机构概况》,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年编印,第87—89页;钱端升等:《民国政制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22—623页。

^② 参见《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一),太原绥靖公署1937年编印,第83页;悲菴:《动乱前夕的山西政治和农村》,《中国农村》第2卷第6期,1936年6月;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85页;中共中央党校本书编写组:《阎锡山评传》,第100—101页。

^③ 李茂盛:《阎锡山大传》(上),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0—255页。

^④ 梁漱溟:《如何奠定现在的国家》,《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73页。

这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的统治方式,都是官绅结合,官府只设在州县一层,基层乡、村的实际管理主要靠乡绅。代官府征收钱粮,完成各项差事的,多由村民推举出来的“能人”^①来负责。由于乡绅^②的生存环境及其所受教化,都要求他们要有好的“人品”,能“严格按照儒家学说立身处世”,因此他们实际上是村庄里的领袖人物。他们或“敢作敢为,处于支配地位,喜欢公众的倾听”,或“公正而谦逊”,能帮村民排忧解难。正因为他们的存在,那些因为善于和官府打交道,得到村民认可,同时也获得官府任命的乡长、保甲等,虽然也可能依仗权势做有一点贪污之类的事情,但人在村中,多半亦不敢过分。^③

自清末新政以还,地方自治成风,士绅在基层的影响作用曾经益显重要。但袁世凯政府上台后,为实现大一统,则反其道而行之,一度下令停办了地方自治。这显然也是阎锡山所乐见的。不论阎口头上怎么讲,他搞的这套新体制,其实也是要通过管理科层化,来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比如,他在全省 105 个县以下再增设区级权力机关,每区设区长一人,都要由他亲自委任。^④虽然村长、村副等仍规定由村民推举,经县府任命,但村长、村副因为直接受命于县府,还要受区、段双重监督,实际上变成主要向行政权力部门负责,贯彻落实上级行政机关布置的各项任务,基本上不受乡村士绅的牵制,成为行政体制最基层的一级小官吏了。

袁氏政府时代,县自治被取消,但县与基层乡村中间还有相当空隙,士绅阶层在村尚有自治条件。阎锡山在山西增设区级政权,在各编村建立正式的村公所,通过区长、警佐等官吏直接插手村政权,就形成了自上而下控制型治理的科层体制。这种把基层行政化和权力化的结果,使得有资格代表官府征发农民的,不再只是 105 个县长,还要加上数百区长,甚至还要再加上必须听命县区政府的万余村官。^⑤而让越来越多的村长、村副,变成凌驾于村民之上,代表官府权力的村“老爷”,也就自然而然取消了传统乡绅作为村民自治领袖的独特作用了。^⑥

基层增设大批机构和组织,包括设置村公所,还不可避免地要大大加重农民的负担。民初以前,“农村社会靠士绅承担乡里公共职能,靠职役系统办理官差”。“里甲、乡地等职役组织虽然具有常设性,但实行的是首领‘独任制’,既不设副职,也不设职能性机构或人员,以一个自然人而不是以一个公共人格来承担区域内公共职能”。他们的工作相对简单,只向村民收取很少的报酬,也没有公共办公地点,不过各居其家,“在家办公”而已。^⑦增设区级即已增加了数百人头费和行政费的开销,村公所及村长、村副的设置,更增多了数以万计的人头费和各项经费的开销。^⑧

① 山西也有称为“社头”者,转见孙江《文本中的虚构——关于“黎城离卦道事件调查报告”之阅读》,《开放时代》2011 年第 4 期。

② 山西有称为“纠首”者,见《马儒行君来书》,转见《梁漱溟全集》第 5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79 页。

③ 参见杨懋春著,张雄等译《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0—179 页;萧公权著,张皓等译:《中国乡村——论 19 世纪的帝国控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14 年版,第 313—326 页。

④ 参见《山西现行政治纲要》,山西政书编辑处 1921 年编印,第 51 页。

⑤ 山西村制曾三变:1918 年底依 300 户设一编村,全省 105 县共划分 425 区,503 街,8681 编村,因而设区长 425 人,街村长 9199 人,街村副 17161 人。1922 年改为 100 户设一编村,街村数达到 4 万,街村长连同街村副数量接近 10 万。1937 年底再改为 500 户为一编村,街村数又相应减至数千,街村长、村副亦相应减少。参见陈祖谦《山西调查记》(共和书局 1923 年版)第 92 页,转见李德芳《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9 页;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 83—85 页。

⑥ 参见周成编《山西地方自治纲要》,泰东图书局 1921 年版,第 80—87 页;《马儒行君来书》,《梁漱溟全集》第 5 卷,第 185 页;梁漱溟:《北游所见记略》,《梁漱溟全集》第 4 卷,第 901—902 页;高苗:《山西屯留县农村经济实况》,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中华书局 1936 年版,第 581 页;悲茄:《动乱前夕的山西政治和农村》,《中国农村》第 2 卷第 6 期,1936 年 6 月。

⑦ 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 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133—135 页;萧公权:《中国乡村——论 19 世纪的帝国控制》,第 319—320 页。

⑧ 规定称:村制之设立,“以百户以上者为一编村,设村长一人,村副一人。其户数较多者,得增设村副,但不得过四人。”村以下设闾,“以二十五家为闾,设闾长一人。”闾以下设邻,“按五家设一邻长,以补助村长副闾长之不逮”。“村公所……以七人为度,即以村长副闾长充任……如过十三人时,闾长分班任事”。“各编村须于主村设立编村村公所”,“各附村得设本村村公所”。邢振基:《山西村政纲要》,“总论”,晋新书社 1929 年版,第 11—13 页;“各论”,第 5—7 页。

按照省村政处拟定的种种规定,村公所及相关人员的开销是通过向村民派村款取得的,有关村款的收取也是有严格限制的。条例特别说明,村款要依村民贫富程度征收,太穷的农户可象征性地缴费1角,再富裕的农户一年缴费也不能超过15元。村政处并特别强调说:“村财政为一村之命脉,少花一文,即留村民一分之元气,增进地方一分之富力。若稍涉浮滥,必致招人怨谤。”为此,它要求各村长、村副必须“廉洁自持,一尘不染”。同时并规定:“每年春节后20日内,必须将经手上年村款一切账簿送交监察员认真稽核……倘发觉村长副有舞弊情事,即分别报告县区严行查办。”^①

但是,相关条例实施了好几年,有关“村款糜滥”的控告接连不断,却始终得不到有效处理。直到1932年,农村经济困难程度实在太过严重,阎锡山才不得不下令清查整顿。经过一年时间的清理整顿,1933年省政府宣布说,仅村财政一项,当年全省各村支出总数即在1135.6万元以上,平均每个农户负担5.21元,相当于每个编村年均开支村财政1000元左右。而有的县村款征收还未减下来,那里农民“每户竟负担在十五六元以上,乃至二十四五元”,远超过村政处所做之规定。^②

5.21元当年对一个山西省农民是个什么概念呢?张稼夫1931—1933年在山西中部的一个小村庄住了差不多3年时间,根据他的调查:若以一家平均5口人计,“当地农家全年最低限度的实际消费为四十五元”,“每人最低限度的食粮消费为二石五斗米—杂粮—平均每石以两元计值,共计大洋五元”。也就是说,5.21元几乎相当于这个时候山西省一个农民全年的口粮钱;二十四五元则相当于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民半年多的全部花费。^③

1135.6万元相对于当年山西全省的财政开支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查山西省当年财政支出合计为1477.4万元,可知已经经过清理整顿后的村财政开支,仍旧相当于省全年财政开支的76%多。已知1933、1934、1935年经过清理整顿,总共减少了村财政支出458.27万余元,相当于每年减少了152万余元,可知清理整顿之前村财政开支每年或高达1280万元之多,几乎等于省财政年度总支出86%。^④

村政改革耗费如此之大,带给省财政最大的好处,只是便利了省政府的赋税征收。一方面,村政改革有助于加征赋税项目;一方面,改革后省政府可通过县长、区长、村长、闾长、邻长,一贯到底,直接管到全省每个农户的家里。政府不仅摊派劳役、杂徭、军需、兵差、征地,可以靠一纸命令行之,就连过去截留之弊多多的赋税征收,也较前得心应手多了。阎锡山于1919年开始制定以发展工业为主的“厚生”计划,在工业方面几乎一穷二白的山西省,能够很快创办出山西火药厂、太原兵工厂,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成立官办西北实业公司,其地方现代工业,如煤铁工业、轻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相继起步,在一定程度上都和阎锡山农村新政取得的财政效用有关。像田赋及附加税征收一项,邻近的绥远实征每年只能征到四五成,而山西实行村政改革后很快就能征到八九成了。^⑤

据统计,在山西省的财政收入中,农业赋税所占的比例一直很高。^⑥20世纪20年代后期曾一度下降,1928年省财政中田赋收入所占比例曾降至25.9%。以后,因战争等种种需要,赋税比例很

^① 邢振基:《村财政》,《山西村政纲要》,“各论”,第16—18页;邢振基:《清查村款条例》(1927年8月18日公布),《山西村政纲要》,“附录”,第20—21页。

^② 山西省村政处:《清理村财政报告(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前言”,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藏,转见张启耀《一个区域社会内的农民田赋负担问题》,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09年,第129页。

^③ 张稼夫:《山西中部一般的农家生活》,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第378—379页。

^④ 转见张启耀《一个区域社会内的农民田赋负担问题》,第126、129页;内田知行著,叶昌纲译:《三十年代阎锡山政权的财政政策》,《山西文史资料》第74辑,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1年编印,第32页表16。

^⑤ 内田知行:《三十年代阎锡山政权的财政政策》,《山西文史资料》第74辑,第14—15页。

^⑥ 按刘建生所列山西省1912—1925年历年收入与田赋比较表,田赋一直占省财政收入的六七成。刘建生等:《山西近代经济史(1840—194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485—486页。

快又升高至 50% 上下了。如 1931 年为 54%，1932 年为 47.7%，1933 年为 49.7%，1934 年为 51.2%，1935 年为 53.2%。^① 可知，农业赋税实收情况的改善，对阎锡山的统治影响是相当大的。

(三) 持续战争加剧农村贫困化

20 世纪 20 年代相当一段时间农业赋税征收比例下降，与阎锡山当时的政策导向有关。1926 年以前，阎锡山近 10 年时间注意着眼于“保境安民”，避免卷入军阀混战，山西治安及经济一度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926 年夏，国民党举兵北伐，阎锡山不再满足于原定方针，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国内战争。他所率领的晋绥军接连投入到北伐、反蒋等战争中，一直到 1930 年底被南京政府打败，被迫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暂避大连蛰居，方才告一段落。这几年持续战争的结果，直接造成了山西财政及其经济形势的恶化。

据查，山西纸币（简称“晋钞”）1919—1924 年发行额不过 500 万元，到 1929 年也只发行到 1300 万元。1930 年中原大战开始，为满足战争需要，晋钞一年的发行量即猛增至 1 亿元，并且流通到了华北各地。^② 然而大战失败，客军入晋，流通外省的晋钞全数回流山西，导致币值狂贬，商号倒闭，富家破产。整个山西省，从 1927 年以后，直至 1935 年，倒闭的工厂、商店数以千计，轻工业损失尤为严重，一度繁荣的蜡烛生产厂家全部关停，铜器生产厂家由 800 家降到 100 家，手工纺织品的销售一度因市场萧条而几近停顿，小商品销售量下降了将近 50%。^③

照理，到 1930 年底，阎锡山因反蒋失利而下野，山西军费开支应该逐渐收缩。然而，阎锡山人去了大连，仍遥控着山西的军政事务。他不仅继续暗中维持着晋绥军的规模，而且让大批反蒋失利的西北军退入山西避祸，每月还拨款帮助维持入晋客军的日常支出。故战争虽然不打了，山西省的军费开支却不见减少。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头几年，山西省的军费开支每年都占到了省全部财政支出的 50% 以上。^④ 这也就是说，1930 年前后山西财政中田赋比例的猛增，很大程度上都用在军费开支方面了。

除了加增农业赋税的负担外，各地军政按人头向百姓摊派的各种增支费用，以及大量向农民征发徭役兵差，尤其是客军的额外开支，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一段时间里更是造成山西农民生活愈见困苦的重要原因。

还在 1931 年，《大公报》记者就针对整个山西南部地区的赋税征发情况做过系列调查。调查称，还在客军进驻之前，各县捐税就已经相当繁苛。以晋城为例，全县 29.66 万人，地 8807 顷 2 分 6 厘，人均占地 2.99 亩；当年亩产粮平均约为 50 斤左右，每人平均得粮应为 149 斤上下，年均每人每日粗麦尚不够半年之食。政府每年所收地丁、屯米及各种契税总计 30 余万元，折合全县每人当年要均摊 1 元多。这还不包括其他畜税、驿马、祭祀，以及马夫、更夫、轿夫、斋夫、皂夫等差徭负担，不算因权力、地位等关系税负畸轻畸重等情况。客军进驻晋城后，各种摊派征发就更是变本加厉了。孙殿英部 1931 年上半年开到晋城，光是已知 6 月向晋城发布的支派项目，就有七八十项之多，从猪、牛、羊、鸡、鸭、菜钱、旅费、借款、烟卷、茶叶、手巾，到麻绳、灯光、厨刀、铁锅、饭碗、墨汁等，应有

^① 见内田知行《三十年代阎锡山政权的财政政策》，《山西文史资料》第 74 辑，第 14—15 页、15 页表 4、26 页表 14、27 页注释 6。又另据 1937 年出版的《十年来山西之财政》一书统计称，20 世纪 20 年代初，土地税只占政府财政收入的 20%，1932 年已增至 45%。转见刘建生等《山西近代经济史（1840—1949）》，第 571 页。

^② 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山西金融志》（上），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4 年编印，第 42 页。

^③ 转见刘建生等《山西近代经济史（1840—1949）》，第 449 页。

^④ 内田知行：《三十年代阎锡山政权的财政政策》，《山西文史资料》第 74 辑，第 34 页表 18；《山西省财政概况》，《申报年鉴（1936）》，申报年鉴社 1936 年版，第 455 页。

尽有,不一而足。^①

如此种种负担加诸农民头上,农民生活之苦,可想而知。以高平县康营村为例,该村有地38顷,286户1862口人,人均不过2亩多。1930年每亩收成平均或有七八斗,1931年因旱每亩收成预计只有40斤左右,人都不够吃。但1930年底到1931年8月中,“供给于军事征发、地方借款、本村公项总计之,做一出入之比较:(一)粮银,全年约320两,计现洋832元,8个月合554元6角6分;(二)军队粮秣,全村十六间,每间每次小米800斤、白面12800斤,共计小米294400斤、白面294400斤,共计约合现洋4500元;(三)差车,每次四辆,共35次,共140辆,每辆约以一元计算,共现洋140元;(四)地口捐款,共票洋58元5角,合大洋15元;(五)村中公项83380吊,又6400吊,约合现洋5550元,总共合现洋10759元6角6分。本年约收1140石(粮),平均七元一石,合7900余元,尚亏2000元,以副产及小商业相抵,则以一年之入款,正抵八个月之剥削”。^②

据时人当年考察,以田赋为例,民国初年,包括山西在内的各省田赋占地价的比率大都在2%以下,20世纪30年代都有升高,而山西省的田赋征收额明显又高于华北其他各省。如1931—1933年,山西田赋对地价百分比平均达到了3%以上,最高达到了3.86%。而同一时期华北其他几省,如河北、河南、山东三省的比率,却基本上只在1%至2%之间,相差一倍以上。^③同一时期山西省兵差的种类更多不胜数,“除骡夫、挑夫、兵丁、钱币外,派征的实物近百种,甚至连化妆品、海洛因、女人也要地方人民供给”。1930年10月至1931年3月初5个月中,闻喜、襄垣、屯留、沁县等县,平均每县兵差费达67万元,为地丁正税的22倍。同样,山西省每一人所缴纳的省税也大大高于河北、山东、陕西、甘肃、湖北各省,分别是山东、河北、广东等省的两倍,贵州省的近三倍,湖北省的五倍。^④

阎锡山搞村政改革,再三强调以村为本,口头上也讲要拯救农村,说是要养成县、区、村的自治基础,^⑤但他的赋税收入绝大多数全都用于省支出,甚至大举用于战争费用,村民还要负担大量的村款开销。这种改革显然对发展农业经济,养成县、区、村的自治基础起不到多少作用。战争所带来的征发徭役,包括大量村款负担,会加速农村破产,也就不可避免了。

从全国土地委员会1937年1月发布的调查报告可知,在全国各省中,就农户破产趋势而言,山西省算得上是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了。在全国十五六个省份的调查比较中,山西省自1930年以来地价(含水、旱、林地)逐年下跌,平均起来也仅略高于宁夏和青海;多数省份农户年收入在25元以下者在1%上下,山西省则达到15.76%,只比赤贫户极多的察哈尔省(51.92%)要好;多数省份收支不敷的农户一般在30%左右,最高者为察哈尔省(52.71%)、广东(52.09%)和浙江(51.00%),山西省排第四,高达47.84%,即全省将近半数农户收不抵支。^⑥这一情况也不难得到当年诸多研究者调查资料,以及记者报道资料的印证。

比如,张桥福考察晋中农民生活状况的文章就举例说明,自1929年以后,当地众多农民的生活水平就在下降,农民主要靠吃最便宜的高粱、玉米面之类的谷物过活,而且这种谷物一天也只能吃一顿,并且只能给下地干重活的人吃。不少农户甚至已经不能靠自己所收的粮食来维持生计了,借

① 《晋南调查之二:晋城社会一般》,天津《大公报》,1931年8月21日,第5版。

② 《晋南调查之八:高平之康营》,天津《大公报》,1931年9月12日,第5版。

③ 《各省历年田赋之变迁与田赋占地价之百分率表》,王毓霖编:《经济统计摘要》,出版地、出版社不详,1935年版,第22页。

④ 张启耀:《一个区域社会内的农民田赋负担问题》,第151—152、158—159页。

⑤ 《用民政治大纲表》(1928年4月12日),邢振基:《山西村政纲要》,“附录”,第87—90页。

⑥ 见《各省民国二十三年乡村地价》、《各省乡村地价历年变动指数》、《各省农家收入多寡各组员数百分率》、《各县农家收入相抵与否户数百分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7),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9、34、36页。

债度日的现象十分普遍。^①

张稼夫在其家乡文水县某村所做的调查,更加具体。他写道:1933年,他所在村农户田内每亩收入不过1.656元,种子、肥料、耕地费每亩就得花去0.744元。但政府当年所征钱粮税、地方附加费、临时军费、临时派款、差车费、巡田费、地方杂费和村公费等,摊到每亩又得支去0.9元,不算农民的人工费和农具损耗费用,农户每亩就要支出1.644元,每亩仅得1分2厘。“以每个农人兼作各种农作,全年可耕亩数平均以十四亩计算,除掉己工不计,每人每年仅可得赢余大洋一角六分八厘。”而当地农户一个劳力平均要负担五口人,即使不算粮食消费,全家五口一年的油盐酱醋等消费也不止此1角6分8厘。不难想象当地农民的日子会过得多苦。据村中一位在村公所充当书记,家境肯定不算太差的农民告诉张稼夫说,一年里他家就有半年多时间吃不上小米,每天只能靠喝高粱末儿稀饭度日。全家除了过春节买过4两煤油外,全年夜里从没有点过一次灯。至于添置衣服之类,更是不敢想了。^②

晋东南的情况也是一样。而且,因为该地区周边多山,不少地方交通不便,长治盆地及其周边虽然土地条件相对较好,但土地集中化程度一般又远高于山西多数地方,因此总体情况和山西其他地区并无太大区别。

据当年有关研究调查资料可知,像长治旁边的平顺县,土地集中的程度就很严重。据赵梅生调查称:这里“半数以上的土地,集中在总户口十分之一强的地主富农手中;而差不多十分之九的贫农,仅赖极少的土地维持生活。”“三十亩以上的二千多富农和地主,每户平均有六十亩以上的土地;十亩至三十亩的四千多农民,每户平均有十余亩;而十亩以下的八千多农民,每户仅平均有四亩的土地。其余的二千八百多户,则一无所有!”^③

除了土地占有的严重不平等外,对当地农民生活造成影响最大的,一个是捐税,一个则是高利贷。仅1933、1934年每年的捐税就有20种之多:“一、契税;二、印花税;三、烟酒税;四、牙税;五、六畜税;六、皮毛税;七、斗税;八、婚姻捐(官婚书);九、戏捐;十、营业税;十一、牌照税;十二、产销税;十三、当捐;十四、附捐;十五、区款附加;十六、警饷附加;十七、巡缉队捐;十八、官佣;十九、所得税;二十、村捐。”这中间,印花税、六畜税、皮毛税等,还不是按一定手续征收,而是按户派捐。“不管你是否需要贴印花,也不管你是否曾买卖牲畜,或是否出卖过皮毛,全是按户捐派。”杂捐中,巡缉队捐数目最大,每年2.7万余元,也是按户派捐。农民虽多方反对,甚至好几次集体到县政府要求取消,都无结果。村捐更是没有一定数目,政府想要多少,便征多少,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征。一年征二次三次不等,1929、1930年有一年中征五六次的。^④

屯留县的情况可能较平顺更悲惨。相关调查显示,1930年11月下半月到1931年3月14日四个月时间,孙殿英一部“共计支应剩余粮秣折价242640元5角9分2厘,支应洋115000元,差车费260000元,总共617640元5角9分2厘。”屯留县自然条件恶劣,地瘠民贫,“多片段之山地,砂碛充斥,丰年肥田一亩只能收一石,瘠田一亩收不过3斗,半月无雨则苦旱,雨大则禾苗为雨水所冲”。捐税原本就很重。据县府公布之收入,不算国税、省税和其他,仅县府所征者已经有27种之多。孙部再大量征发粮秣兵差,屯留县县长亦感难以承受,不得不几度上书省府大诉其苦。称屯留现有驻军三团,托言代购,四五两月即欠洋20万元,六七两月又需省票7万,孙师长未发分厘,而民

① 张桥福:《晋中农民之生活状况》,转见刘建生等《山西近代经济史(1840—1949)》,第449页。

② 张稼夫:《山西中部一般的农家生活》,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第378—380页。

③ 赵梅生:《山西平顺县农村经济概况》,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第560页。

④ 赵梅生:《山西平顺县农村经济概况》,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第572页。

间粮草,已搜罗一空。“值此青黄不接,民不聊生之时,起无可起,征无可征”。^①孙部驻屯留、长子、晋城一带近3年时间,仅屯留一县农民就为之付出了面粉203.315万斤,小米230.652万斤,玉米面113.091万斤,麸子5.5875万斤和谷草485.293万斤,外加36356块大洋。再加上孙部军纪极差,征发摊派种种外,还动辄抢掠商铺和民众,更不知挥霍损耗了多少劳力和财物。^②

由于屯留多年处于一种多方力量纠葛的状态,官绅间矛盾亦深,虽然官员贪污司空见惯,却还是有两任县长都因“刮钱”数万元被乡绅告至省里而丢了官。但受到地方大户支持的一些村长、村副,同样劣迹斑斑,却无人奈何得了他们。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土豪,惯于敲诈,不但公杂费尽量增多,甚至巧立名目,如书记费、笔墨费、车马费、旅费,更还有什么‘其他费’等等”。足以见这所谓村政改革,实在给农民“增加了许多负担,增加几层盘剥”,不少地方未见起到多少有利于农民生活改善的效果。^③

由于当地太过贫困,影响到占该县农户17.83%的贫农家庭的男性几乎结不起婚。屯留原本男女比例就严重失调。1935年统计,该县男性达到6.9856万人,女性只有5.3267万人,女比男少了1.6589万人。当地农民又穷,贫农更不用说,吃饭都是有上顿没下顿,而当时山西许多农村都“实行买卖婚姻,妇女就是财产”,但地区不同,男女比例不同,价格也大不相同。在屯留县,由于女性人数少,外嫁他县者亦多,故二三十岁的单身女性至少要花几十元,甚至上百元才能娶进门。一旦“农民的老婆死亡时,多半无力续娶,只好当鳏夫。而极贫的农民,根本上也就无力为儿子完婚……有些极贫的农民,一生从没有闻过女人味!”^④

(四)为防共自保推出的大胆措施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一举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12月15日,蒋介石为谋求国民党内各派力量重新合作,通电下野。随即,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召开,阎锡山得以恢复中执委资格并被推举为国民政府委员。次年2月20日,国民政府特派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得以重掌山西军政大权。^⑤

重回山西后,面对经济形势严重恶化的情况,阎锡山再度把注意力放回到经济发展上来。他公开提出“自强救国”“造产救国”之类的口号,成立了经济建设委员会,组建了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制订并推行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由于他全力以赴,甚至把相当部分军队用于筑路,因而几年时间就使山西省在工业交通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据说,其控制下的省营资产,增加了四五倍之多,到1936年时总值已达到1亿元以上。^⑥但是,阎锡山的十年建设计划在相当程度上却是建立在牺牲农民利益的基础上的。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并没有能够阻止农村经济破产的残酷现实。进入1935年后,就连省会太原郊区一些士绅都开始感到走投无路了。

这一年年初,一位老举人就在日记中痛陈道:“今年腊月与往年腊月迥然不同,往年债务尚可容缓,现在债务未到腊月,入冬以来势已急迫,无容缓之致。则‘民穷财尽’四个字跃跃然活现眼

^① 《晋南调查之五:董尔屯留》,天津《大公报》,1931年8月31日,第5版;《晋南调查之十一:民苦兵亦苦》,天津《大公报》,1931年9月17日,第5版。

^② 参见张玮、董媛《“客军入晋”与晋南社会》,《山西师大学报》2007年第1期;刘峰博:《阎锡山与中原大战后山西“客军”问题的解决》,《兰台世界》2008年第3期;高苗:《山西屯留县农村经济实况》,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第573—574页。

^③ 高苗:《山西屯留县农村经济实况》,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第574、581页。

^④ 高苗:《山西屯留县农村经济实况》,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第577、586—587页。由于男女比例关系,同样贫困的晋北,妇女的价格就比屯留低得多。如1936年祁之晋就撰文说明:在晋北农村,大部分地区的年轻妇女或女孩花2—25块大洋即可买到。祁之晋:《“土地村有”下之晋北农村》,转见刘建生等《山西近代经济史(1840—1949)》,第449页。

^⑤ 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5、330页。

^⑥ 参见李宗陶《阎锡山:能成大事业,难得大机缘》,《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7月号;中共中央党校本书编写组:《阎锡山评传》,第225—227页。

前,仍无救济之方法,民已到九死一生之地位,而大小官员毫无忧恤民瘼之意,仍然严征钱粮,需索公款,加增捐税,逼迫村款,以致小民鬻妻卖子,典房卖地,纳粮缴款,迫不容缓。各村乡长且因村民所欠村款,率领保卫团丁到欠款之家夺民口粮,劫取物件,抵补村款,否则呈控于县,拘留于看守所,家中缴纳村款,方准讨保释放。拘留之人,竟有被拘染病,由看守所出不数日而即死者,各县皆然。”^①

一年后,腊月刚过,虽然一年来一家人能省则省,连老先生也已经每天下地去干农活儿了,进到新的年关,却还是连饭都要吃不上了。老先生在日记中记述称:“家已贫穷,将有绝粮之患,欲购无钱,欲赊无处,市面概不周行,邻里亦皆窘困,世局业已动摇,摊派层出不穷,官吏金不恤民,人民均没生路。”^②

阎锡山这时也非常清楚村政改革已经失败了。他也知道,各层级官绅的掣肘反对及县、区、村各级官僚以权谋私,是改革导致农村破产的关键原因之一。但阎锡山的改革也好,统治也好,都必须依靠各级官僚,包括地方士绅大户的支持,故自改革以来虽不断有各地村民联合控告村长、村副借公营私、专横自恣;控告县区官长对此听之任之,包庇保护,甚至串通一气,鱼肉乡里,贪赃枉法,但阎锡山却常常只能睁一眼闭一眼,不能有所作为。他总是一面屡屡训令严查贪官、污吏、劣绅、土棍;一面却又再三叮嘱各级官员不要得罪了各地的绅士大户。^③他很清楚,基层社会关系盘根错节,牵一发可能动全身,断难靠一纸训令解决问题,过分强硬不免会造成上下扞格,动摇统治的基础。因此,他一段时间里只能不断发文和训话,对下面的官吏谆谆教诲,劝告他们要以身作则和积极行动,说什么“无论多少办法,多少团体,知事心力不到,俱是假的!”^④

事情到了1935年,阎锡山再也敷衍不下去了。一年前,中共红军在与山西仅一河之隔的陕北地区突然壮大起来。应南京中央的要求,晋军^⑤曾渡过黄河,协助陕西杨虎城部进剿。但这次进剿毫无成效。不到一年时间,中共中央红军也北上来到陕北,陕北红军及其根据地反而更加壮大了。陕北红军的快速发展,让黄河东岸的阎锡山神经极度紧张,因而不能不开始高度重视山西农村的问题。为平息基层村民的普遍不满,他毅然动用省政府的力量,接连惩处了贪污枉法民愤太大的县区级人员10余人,村长、村副20余人。^⑥

阎锡山深知中共革命根本上是靠“抗债分地利诱贫民”发展起来的。陕北所以能够成为中共红军的立脚点并日渐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陕北瘠贫之特况,迥非他处所可比也”。^⑦而山西农村日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农民贫困者日渐其多,一旦被中共红军利用,后果不难想见。1936年春红军东渡黄河,横扫晋南十余县,数千贫民追随而去,更清楚地显示了这一危险。故阎锡山已不能不开始公开承认:“年来山西农村经济,整个破产,自耕农沦为半自耕农,半自耕农沦为佃农雇农,以至十村九困,十家九穷,土地集中之趋势,渐次形成。在此种形势之下,不但佃农雇农最易受共匪之煽惑,即自耕农、半自耕农,鉴于自己之经济地位,日趋动摇,亦易受共匪之煽惑。”

① 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92页。

② 刘大鹏遗著:《退想斋日记》,第494页。

③ 阎锡山于1930年召开的省第二次村政会议上就告诫说:“吾人办事,公道是一定要主张的,但为政不得罪于巨室一层,也要顾及。盖响存一决不让大绅士胡闹的心,而手段上绝不用得罪他的法子。”转见张启耀《一个区域社会内的农民田赋负担问题》,第225页。

④ 《山西省政府指令介休县办理村政要心力俱到文》,吴树滋、赵汉俊辑:《县政大全》第4编,普益书局1930年版,第126页。转见张启耀《一个区域社会内的农民田赋负担问题》,第130页。

⑤ 阎锡山辛亥后任晋军大都督,故其麾下山西军队一般称晋军。1926年进据绥包地区,1931年晋军将领傅作义代理绥远省主席,故晋军又称晋绥军。

⑥ 山西省政府村政处:《清理村政报告(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第3页,转见张启耀《一个区域社会内的农民田赋负担问题》,第220页。

⑦ 《上蒋委员长电》(1936年7月18日),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5卷,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839页。

他宣称：“共匪即以土地革命为夺取农民心理之要诀，而农民只知要求土地，并不知何者为共产主义，则共匪必乘此空隙，激起农民暴动，扩大赤化范围。”^①

还在1935年，阎锡山就已经想出应对和防范共产党的办法了。他除了主张中央及陕、甘、宁、晋共同围剿陕北红军外，特别提出了一个在他看来既能够有效防止中共煽惑农民，又能够将全省农民组织起来“胥归摄制”的釜底抽薪之策。这就是，借助中共的口号和政策，先予农民以土地，从而把农民组织到自己的组织中来。

1935年秋，阎锡山首先上书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希望能够得到南京方面的支持。他在信中具体说明了他的这一设想与办法。他写道：和共产党争农民，“舍实行先总理‘耕者有其田’之政策外，更无较有效、较有把握之办法”。今日“土地私有，为赤化农村之导火线，为摧毁国家之爆炸弹”。“就消极方面言，若不解决土地问题，实无法防赤化而保国家。就积极方面言，土地村公有，分配耕农，全国至少可以得六千万稳定之农民”。如能“由山西先行试办，则山西农民为共党煽惑之目标者，可一变而为拼命防共自动武装之民众，此不但为防共之要图，亦即国家长治久安之政策也”。他宣称：“山诚日夜焦思，以为防共图存，舍此别无良法。土地村公有即土地革命，今欲成其大者，即小者受若干之牺牲，亦势不得已。”^②

阎锡山的这一主张没能得到蒋介石及南京中央的认同^③，但他坚持认为“不解决土地问题，实无法防赤化而保国家”。^④因此必欲要在山西试行此法。他不仅颁布了《土地村公有案办法大纲》，规定“由村公所发行无利公债，收买全村土地为村公有”，再由村公所依合乎耕作年龄的村民数量划为等份，分配给村民耕种^⑤；而且开始公开宣传此一政策主张，并训示军政官员称：以山西今日之情势，“共匪必成大祸”，“防共之法，我想不外两种：一、将全省共产目标的一百二十万户人民，自行武装起来，在大空隙中，大奋斗，拼命以自卫。二、实行井田意义之制度——耕者有其田，使佃农雇农安定化，以消除煽动的大空隙，并使社会基干之农民武装化，以保卫社会之安宁”。^⑥

实行“土地村公有”，地主自然要受损失，但在阎看来，“今欲成其大者，即小者受若干之牺牲，亦势不得已”。因为地主人数不多，且政府对其土地“分年付价”，“所损者仅少数之利息”，“绝无多大之阻力”。反之，占人口十分之七的贫民则会因此得益，生活安定，心理巩固，共产党土地革命的号召也就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了。反之，农民的基本需要能够得到满足，政府要想把农民有效地统制起来，也就不是一件难事了。因此，他的结论是：“救目前之急，防共可也，富民自卫可也。图久安之计，则非消共不可，即非实行土地村公有政策不可。”^⑦

^① 转见《申报年鉴(1936)》，第898页。

^② 《阎锡山上蒋委员长三十年防守国策电》(1935年9月28日)、《阎锡山复蒋委员长村田社有与土地村公有区别及对国家前途之关系函》(1935年10月23日)、《阎伯川先生要电录》，阎伯川先生纪念会1996年编印，第413—416页。

^③ 蒋介石复电委婉表示了不同意见，称“‘耕者有其田’之实施方案，关系土地转移，影响遍及山陝僻壤，于其取予分配之间，利害参错，绝非简单，亟待多事考量，审慎周详，俾臻妥洽”。《蒋委员长耕者有其田方案待多考虑电》(1935年10月8日)、《阎伯川先生要电录》，第413—414页。

^④ 《阎锡山复蒋委员长村田社有与土地村公有区别及对国家前途之关系函》(1936年10月23日)、《阎伯川先生要电录》，第415—416页。

^⑤ 《土地村公有制办法大纲》、《土地村公有办法大纲及说明》(1935年9月23日)，转见《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七)，第91、94、97—98页。

^⑥ 《防共两途径——出席太原绥靖公署山西省政府联合纪念周讲话》(1935年7月29日)、《防共必要之认识——出席太原绥靖公署山西省政府联合纪念周讲话》(1935年8月5日)，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5卷，第1840、1841页。

^⑦ 《富民自卫是防共，土地村公有是消共——对八十四县绅民考察陝北“匪”情代表讲话》(1935年12月13日)，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5卷，第1881页。

可以看出。阎锡山的“土地革命”设想，根本目的还是想把民众有效地组织到政府领导下来，土地公有只是不得已的一种吸引农民的手段。也正因为如此，他由衷羡慕的是中共能够成功地使人民“尽为‘匪’众”，“贫民皆为自卫军，壮妇皆为后方队”。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解释他所以要搞“土地村公有”的理由时即再三提到，共产党“兵不精，械不利，训练尤劣，竟能与数倍以上之国军劲旅为长时间之顽抗”，全是由于共产党用土地换得了农民的投名状。结果，“国军到者少，则民尽是匪；国军到者多，则匪皆为民”，使政府剿不胜剿。^①他显然也希望能通过“土地村公有”，得到无数“与国家有利害关系之农民，使其武装起来”，为政府所用。^②

也正因为如此，考虑到远水不救近火，他一边先拿几个村子去试行“土地村公有”，一边已经急不可待地发起各种政府领导下的民众组织，想要把全省的军、政、工、农、学各阶层都分门别类地组织起来了。如在军政系统干部中，他计划组织“自强救国同志会”；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计划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以下简称“牺盟会”）；对农民，则打算以村政改革为基础，组织一个强调传统道德伦理观的“主张公道团”（以下简称“公道团”）。

把农民组织进公道团，就是急于赶紧把农民组织起来反共防共。阎锡山对此说得很明白，即：“共党号称有主义、有组织，其目的在推翻现社会。他们的组织很严密，所以与官军对抗时十分顽强。我们要剿除共党，不能和剿除流寇一样。他有主义，我们也要有主义。我们的主义是‘公道主义’；他有组织，我们也要有组织，我们的组织是‘好人团体’。”^③

像其他同志会、牺盟会一样，阎锡山也是公道团的总团长，并在太原设立总部，在各县、区、村分级成立团部。按规定，各县、区团长都由省里训练后统一分配，村级干部由当地县、区训练选拔配备。从1935年底开始，这个公道团通过县、区两级机构层层部署推动，经由各村公所代为组织，很快就开始在农村中发展起来，大批青壮年农民形式上都被编入到这个公道团中去了。

战争开始前后牺盟会的崛起

（一）借助前共产党人对抗共产党

自1931—1932年日本占据东北三省之后，就一直在不断地向关内进行蚕食。1933年初日本占据热河，接着又部分侵入河北、察哈尔、绥远各省。绥远是山西的北部屏障，晋绥又都在太原绥靖公署统辖之下，因此，阎锡山很清楚，在不久的将来，中日将难免一战。

阎锡山认定，以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和工业发达的日本打仗，光靠装备、组织、训练、配合，以及知识程度普遍低下的中国军队，是毫无希望的。中国抗日，非得动员全国十分之七以上缺少资产之贫苦农民出来牺牲和拼命不可。问题是此多数农民恰恰又最易“受共党之煽动”，动员他们出来拼命，首先就要和共产党进行较量、争夺。这也是阎锡山1935年以后会特别看重共产党人让农民纳投名状的办法，进而提出所谓“土地村公有”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相信，只要政府能让农民人人有田种，就不难像共产党那样发动起万千民众，并使之“有为国效命之牺牲精神”。用他的话来说，只要中国数万万农民能够参战，“自信世界任何强国，无能亡者矣”。^④

道理虽如此，但无论是搞“土地村公有”，还是建全省各阶层、各行业的群众性政治组织，包括

^① 《上蒋委员长电》（1935年7月18日），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5卷，第1839页。

^② 《阎锡山复蒋委员长村田社有与土地村公有区别及对国家前途之关系函》（1935年10月28日），《阎伯川先生要电录》，第414—415页。

^③ 王生甫：《抗日战争中的牺盟会》，第261页，转见中共中央党校本书编写组《阎锡山评传》，第228页。

^④ 《阎锡山上蒋委员长三十年防守国策电》（1935年9月28日），《阎伯川先生要电录》，第412—413页。

宣传动员广大人民,靠阎锡山身边的旧军人、旧官僚和地方上的旧官吏、旧士绅,显然都没有可能。村政改革受挫的教训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方案设计再好,找不到能够落实又不会贪腐的有能力的干部,一切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阎锡山从开始设想这些问题和方法的时候,就很清楚,自己身边那些旧派人物是无法用来做这些事情的。在这时的中国,既熟悉民众动员,又有群众组织工作能力和经验的人才,只有共产党里有。同样的情况,要能够用共产党的办法去落实土地村公有,并把农民组织起来,也非得用在共产党里工作过的人不可。这时给了阎锡山以很大启发的,是邻省陕西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的经验。杨自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一直很注意争取吸收那些与中共组织失联或被捕获释的前共产党人,让他们为自己工作。他的努力也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军政力量乃至文化宣传方面,都加强了不少。^①

从1935年开始,阎锡山即着手悄悄地做这样的尝试了。他首先找到了做过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和张家口特委书记,后被开除了党籍的张慕陶,和刚刚刊登了悔过启事出狱,曾担任过中共山西省委委员、太原地委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郭挺一等人。根据他对共产党的了解,凡是被捕后公开反悔并发表过反共启事的中共党员,“共产党组织就不会信任他们了”。显然,这恰好是阎锡山最看重的,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好放心使用这些有才能、有经验的宣传鼓动人才。^②

阎锡山这时身边最为倚重的,是姨表侄梁化之。梁1931年刚从山西大学文学院毕业,次年阎重返太原做绥靖公署主任,就要梁做了机要秘书。1936年初正式成立自强救国同志会,阎自任会长,梁被任命为总干事,全权负责实际的组织工作。这是因为阎锡山此时把组织工作看得比什么工作都重要,而他相信,以梁在山西大学学生活动中的经验,不仅更熟悉这类群众组织工作,而且也更容易找到比较左倾又擅长做群众工作的人士。梁化之也不负所托,上任不久就通过自己在北平的同乡网络,帮助阎发现了一个极具实用价值的人才——薄一波。

薄一波是山西定襄县蒋村人,与出生于五台县河边村的阎锡山是大同乡,与同为定襄人的梁化之不仅是小同乡,而且还是表兄弟。大革命期间薄在太原学生运动中很有名,1931年被捕判刑前是中共天津市委军委书记、北方局军委秘书长,多年从事兵运工作。梁化之通过他在北平的同乡会成员,意外地在1936年8月31日出版的《华北日报》上读到了有薄一波(化名张永璞)列名其中的一则“反共启事”。^③梁化之立刻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阎锡山。阎非常重视,马上安排当年曾经和薄一波一同在太原工作过的郭挺一去北平反省院见薄。

9月中,薄一波出狱,梁化之已预先做好安排,把薄迎回太原,并介绍给了阎锡山。阎、梁两人进而“推心置腹”地向薄说明了希望大家“肝胆相照”,共同守护山西的计划。而薄亦当场表示了愿意“追随总座”“共策保晋大业”的意愿。^④

^① 1930年前后陆续得到杨虎城重用的共产党人至少有数十人之多,其中较著名者,就有南汉宸(曾任省府委员兼秘书长)、王泰吉(曾任新兵训练处处长)、阎揆要(曾任警卫团团长)、张汉民(曾任警备第三旅旅长)、宋绮云(曾任西安绥署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主编)等。姚文基:《中国共产党与杨虎城关系浅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27—829页。

^② 牛荫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纪略》,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15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③ 《徐子文反共启事》,《华北日报》,1936年8月31日,第4版。

^④ 薄一波晚年回忆称1936年秋第一次回山西时并未见阎锡山,似不确。已知薄1936年两度回太原,一次是秋天,即9月,一次是初冬,即11月初。1980年薄回忆时曾说明自己第一次回太原“见了阎锡山”。1939年秋冬薄也有说明显示第一次回太原期间是见了阎的。其函称:“民二十五年秋回晋,由化之同志介绍”,“蒙总座推心置腹,肝胆相照”,“遂决定追随总座”。参见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第198、205—206页;《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1980年5月5日),《薄一波论新军》,第341页;《致梁化之》(1939年10月30日、12月11日),《薄一波书信集》(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阎锡山、梁化之不了解的是，薄一波等人发表“反共启事”，与郭挺一等人有很大不同。此举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鉴于干部奇缺，报经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特批后采取的一种营救北平在狱干部的策略方法。^①也就是说，薄一波等人不过是按中共党组织的安排行事，并非如郭挺一等那样，自己主动脱离了共产党。但阎、梁等却并不了解这一内情，误以为薄等人是真自首。既然自首，也就断难再回共产党，阎、梁也就可以放心“利用其长”来帮助自己“组织民众”了。^②

由此可知，薄一波9月回太原见阎，并承诺与阎合作，其实是经过刘少奇领导的中共北方局特批的一种秘密的统战工作方式。换言之，薄一波没有暴露自己依旧是共产党员，并仍在北方局领导下工作这一情况，更不曾代表北方局与阎锡山谈判合作条件。^③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得到了阎锡山和梁化之的充分信任。

（二）牺盟会的迅速发展及影响

牺盟会筹委会是经阎锡山批准后，于1936年10月12日在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大礼堂宣告成立的，18日宣布成立临时执委会，会长阎锡山、副会长赵戴文。薄一波等11月初到太原正式开始工作后，考虑到对日军事准备的情势，薄一波原先做过兵运工作，阎锡山首先就把组训军队政工干部的军政训练委员会交给梁化之和薄一波来负责，并授命他们招募组织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提出要争取训练30万国民军的目标。^④鉴于这一任务必须要有广泛的群众组织的配合，薄一波这才接手了刚刚成立，尚未开展活动的牺盟会这一组织，准备将其发展成为向下招募、宣传、动员和组织民众的重要机构。

阎锡山让薄一波参与负责军政训练和牺盟会工作，正是想要把山西各地的群众力量发动组织起来。他明确讲，山西需要“全民总动员”。^⑤而他想到的能够把民众统合到自己统一领导之下的动员方法及口号，很多又恰恰是借用了共产党人的方法主张。因此，薄一波等人这时提出的各种建议，阎亦多半都认为合理，故颇多采纳。诸如“实行民族革命战争”“军民打成一片”“官兵打成一片”“制裁坏官、坏绅、坏人”“消除社会不平”“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优待抗战军人家属”等口号，甚至是主张，阎锡山都直接或间接地表示了认可。

利用负责军政训练和牺盟会组织发展工作的便利条件，薄一波等于1936年底1937年初先后组织了村政协助员训练班，以及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将从地方招募来经过一周左右短期培训的上千名村政协助员分散到全省各县基层去，“把亡国灭种、沦为殖民地的可怕前景”，把阎锡山关于“制裁坏官、坏绅、坏人”的主张，宣传到民众中间去；同时“用十人团的方式”组织农民。通过这种短期培训，一变十，十变百的几何式扩散方式，只用了短短三个月左右的时间，牺盟会会员就发展到

①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第184—189页。

② 参见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5卷，第2158页。

③ 薄一波晚年关于这方面情况的回忆似不准确，他多次强调说，从郭挺一1936年8月底到监狱中看他开始，他就明白告诉郭自己并未脱离党；见梁及后来见阎时，都说明过自己仍是共产党员，并据此与阎、梁谈判，商定了“约法三章”，即中共方面承诺不在山西军政系统中发展共产党组织，阎则同意他用习惯了的共产党的语言说话行事；允许他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允许他使用共产党人开展工作。但薄自己不同时间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如他在1979、1980、1984年的回忆中对自己出狱时间的说法就差距很大，从8月底到9月下旬都有。他并且说：他从监狱中出来后阎锡山的代表才去看了他，请他回山西，开始还被拒绝了。他后来回山西，是“北方局派我和几位同志到太原了解情况，争取留在山西工作”的结果。他对“约法三章”内容的说明也有不同，说三条是“允许宣传共产主义、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允许在我们主持的群众团体、武装部队中任用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我们邀请去的人只做抗日救亡工作等三个条件”。分见《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第198、206、209页；《关于牺盟会、决死队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1979年9月12日）、《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1980年5月5日），《薄一波论新军》，第337—338、340页。

④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第214—215页。

⑤ 转见《阎伯川先生感想录》，台北，七海印刷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36页。

了60万人之谱,并且还顺利地完成了阎锡山要求的组织两万名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的任务。^①

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的主要工作是政治教育,其教员自然由薄一波等人选派,军事教员则由山西旧军官来担任。教导团总共编组了10个团,分散到崞县、忻州、祁县、太谷、寿阳、平遥等处进行集训。同时,薄一波等还从全国各地招收来4500名青年,举办了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

薄一波等人所采取的民众宣传动员方式是典型的共产党人式的。以太南地区壶关县牺盟分会为例,村政协理员培训班只经过9天培训,就把40余名受过一定教育的青年积极分子三四人一组,分派到县城周围各乡、村进行按培训内容向民众进行要求制裁坏人和准备抗日的宣传。其宣传方式主要是当街演讲和教唱歌曲等。这种浅显生动同时鼓动性强的宣传形式,很容易对基层的青年人产生广泛影响。大批农村中出来的,多少受过一点初等教育的青年人,被鼓动起来后,又主动回到农村中去,成了牺盟会在农村中反抗“坏官、坏绅、坏人”的活跃分子。^②

对于这样一种工作方式及其效果,薄一波一年多后有过一个总结。他写道:“工作开始了,真如黄河决口,像一股不可遏止的洪流,几千年来被压抑着的民气觉醒起来了。老百姓过去曾经是除纳粮以外什么都不过问也不晓得过问,现在改变了。他们要实行阎主任的格言‘消除社会不平’、‘制裁坏官坏绅坏人’,要‘组织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宣言‘拥护西安事变中的抗战主张与统一战线’……过去非法的东西,现在合法了;过去感到大逆不道的东西,现在认为是抗日必须的东西了;过去认为是‘过激’的青年,现在认为是这些‘过激’青年真救国呀!”一切的一切都起了一些变化。”^③

由于牺盟会的组织以及军政训练工作的发展大大超出了阎锡山的期待和想象,因而阎也乐于给予薄一波等人更大的权限。还在七七事变爆发前,阎锡山就批准牺盟会抽调180余名骨干人员集中培训,经梁化之重点谈话审查和阎亲自训话后,即以牺盟会特派员的名义派到各县做监督指导工作。之后,根据他们所做报告和薄一波等人的建议,不少县原有的公道团被牺盟会合并了,还撤换了一批工作不力的县长。凡是县政府被牺盟会掌握者,当地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团体多迅速发展起来,并且还纷纷尝试着组织了农民武装,即脱产或不脱产的农民自卫队。

1937年9月,牺盟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人中,中共秘密党员及所谓前共产党人占了一半以上,7名常委中6人是中共秘密党员及前共产党人。按照当时同为牺盟会负责人之一的牛荫冠的说法,“牺盟会从总部到各个委员会以及各中心区、县的负责人,绝大多数是在当地党委领导下的共产党员,可以说共产党和左派势力是掌握实权的”。^④

几乎与此同时,阎锡山下令将事实上在梁化之和薄一波掌握下的军官教导团改编成了青年抗敌决死队。按照薄一波的建议,原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的学员多被派去充任决死队的基层政工骨干。决死队成立初期只有3000支枪,靠牺盟会的帮助,在晋东南、晋东北、晋西北和晋西南4处编成了4个纵队,人枪很快都扩充起来了。到1939年,这支武装已发展成为40多个团,约6万人的规模,变成了与阎锡山过去依赖的晋绥军有明显区别的一支山西“新军”。

据各地上报的数字统计,到1939年秋,牺盟会会员已发展到近90万人,脱产的农民自卫队、游击队已达10万人左右,牺盟会领导下的农救会会员达到116.2万余人。战争开始后,即1937年10月,阎锡山把山西全省105个县,划分成7个行政区,设立7个政治主任公署(后改为“督察专员公

^①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第215—218页。

^② 王贵祥、武发好:《张恒业与壶关党的早期活动》,《长治文史资料》第9辑,长治市政协文史处1991年编印,第68—69页;《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组织部给北方局的工作报告》(1940年8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6页。

^③ 转见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第217—218页。

^④ 牛荫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纪略》,《山西文史资料》第15辑,第8—10页。

署”),任命了7个政治主任(后改为“督察专员”),代行省政府职权,可以直接委派县长。阎任命的7个专员中,4个专员兼保安司令实为共产党人。这种情况也极大地便利了八路军在山西的立足与发展。牛荫冠认为,抗战开始后八路军能由出动时的两三万人,以山西为基础在一年多时间就迅速发展发展到22万人,相继建立了晋绥、晋察冀、太行、太岳几个敌后根据地,多半就是因为牺盟会在山西拥有相当广泛的民众工作基础,并掌握着半数左右的县政权。他肯定地说:“到一九三九年左右,全省一百零五个县,就有六十二个县完全被共产党所控制。除此之外,还有一二十个县我们的势力也是相当强大的。”^①

(三) 阎锡山以妥协求合作的策略

严格地说,牛荫冠上面的说法只讲到了问题的一面。毕竟,牺盟会的会长还是阎锡山,总干事亦即牺盟会实际总负责人,也还是阎的亲信梁化之。薄一波及其总部以下各中心区、县负责人的所有政策主张,依旧得遵照阎锡山的政策主张行事,重要问题均须呈请阎、梁认可批准才行。由于牺盟会的人事还是在阎、梁的控制下,除中执委中还有近半数旧派人物外,像军政训练委员会中的重要部门也多掌握在旧派人物手里,决死队中基层政工干部多系左倾青年,但班排长以上各级军事干部却多是旧军人。

人所共知,“阎先生对共党学说之可惧,惧到万分”^②,因此,他对共产党渗入牺盟会及决死队的危险始终相当警惕。自1935年以来,阎锡山讲话中谈得最多的,就是“防共”问题。他甚至把“防共”具体划分为“思想防共、政治防共、民众防共、武力防共”四个方面,还专门组织有“防共保卫团”,并明确提出了“防共就是救国”的思想。^③

1937年,国共两党谈判并妥协之后,阎锡山公开不讲“防共”了,但是,他对共产党的警惕与组织上的防范丝毫没有减弱。每一发现自己的组织,包括牺盟会、决死队等有共产党活动的蛛丝马迹,他就会采取措施严厉禁止和阻断。从北方局的相关函电中就经常可以看到在这方面发生冲突摩擦的情况。

如1938年6月,北方局就报告中共中央称,梁化之对牺盟会中共产党“防范甚严”,尤其注意密查往来信件,如“特派员李庆糊、民大二分校指导员刘宝珍因嫌疑已在押询中”。^④7月,中共中央亦有电报提到:“最近阎与梁化之在各地严查共产党,方山、吉县牺盟及民大某些工作人员已被捕,吉县游击队三大队被缴械”等。^⑤因此,1938年春夏,当中共中央发觉“阎、梁已怀疑他的新势力中有共产党”之后,曾特别提醒相关部门说:“秘密工作尤其某些特别关系必须十分警戒,禁止公开工作人员随便写信,对违反一切秘密工作的行动须给他处罚。”^⑥

由此不难看出,薄一波等人所以能在阎锡山、梁化之身边较长时间受到信任并发挥作用,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和与中共党组织的关系。同时,他们也能

① 牛荫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纪略》,《山西文史资料》第15辑,第75—77页。

② 《徐永昌日记》第3册,1936年12月18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508页。

③ 《对防共政治工作人员讲话》(1935年9月1、5、11日)、《防共应先知共——出席太原绥靖公署山西省政府联合纪念周讲话》(1935年9月2日)、《如何使人民说我们好如何将事情办好——对防共保卫团干部讲话》(1935年10月10日)、《颁发防共保卫团团丁须知》(1935年10月11日)、《主张公道团团员须知》(1935年11月17日),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5卷,第1845—1847、1859—1863页。

④ 《杨尚昆关于阎锡山的动态及巩固山西统战工作的意见》(1938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130页。

⑤ 《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应从各方面进行巩固动委会工作致程子华电》(1938年7月4日),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山西新军概况》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

⑥ 《毛、洛、胡关于减少阎锡山的怀疑问题给朱、彭等的指示》(1938年7月14日)。

依照北方局的指示,比较认真地贯彻阎、梁的指令与要求,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实现了阎、梁希望达到的发动组织民众力量的意图和主张。

不论阎锡山如何千方百计地防范共产党的渗透,极力想把牺盟会和决死队控制在自己手中,牺盟会和决死队相当激进,且有如共产党下层组织的形象,还是显而易见的。这固然和薄一波等牺盟会主要负责人原本就具有共产党人固有的政治特色有关,也和阎锡山自1937年以来处处想要借助共产党宣传组织民众的方法,把自己的政治口号和政策主张弄得很左倾、很激进有关。

1937年8月25日,八路军正式编入第二战区序列,归阎锡山指挥。随即,日军大举攻入山西,阎锡山亦迅速开始部署八路军到山西境内参加抗战。9月16日,阎在与中共中央代表彭雪枫会谈时,还明确提出了“一旦出现津浦路平汉路失守、晋军败退的不利局势,以八路军会合晋军一个集团军,在五台山山脉建立根据地”的建议。^①正是依据阎锡山的这一建议,毛泽东很快形成了与晋军在山西结合起来,发动并武装民众,主力“待敌相当深入后,向灵、涞、广、蔚及其以北突击,捣其空虚后方”,以及在太行、太岳山脉之晋东南、吕梁山脉之晋西南、管涔山脉之晋西北和晋东北四区分别部署与准备,创立战略根据地的设想。^②经过与阎锡山协商并征得同意后,八路军三师也因此确定了各自的活动范围:一二〇师在晋西北,一一五师在晋东北,一二九师在晋东南。^③

为坚持山西抗战,阎锡山这时较重视与八路军的合作。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在部分沦陷地区,他明确批准与八路军合作成立“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放手让共产党、八路军在山西沦陷区域内和他的军政系统一起发动民众抗日、组织民众武装。^④注意到八路军实行政委制对军队的政治控制很有成效,他也批准决死队搞政委制,以强化部队的政治鼓动工作。注意到八路军主张减租减息,他也提出“合理负担”,并下令取消苛捐杂税。知道共产党颁布了一个“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也批准颁布了一个《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其内容有的比共产党的十大纲领“还左些”。^⑤

阎锡山不仅提出了一些激进的口号和政策,在日军大举入侵山西后,他在干部任用上也越来越重视左派青年,甚至愿意让牺盟会中那些左倾的青年人独当一面。这是因为,战争打响后,阎锡山“曾电全省一百零五位县长,征求是否愿继续留任游击县长,经答复同意者仅有三人”,只有牺盟会的左派青年干部积极响应。阎因此也打破常规,大胆批准任用这些青年人。结果,“忻口会战结束,太原保卫战行将开始,(牺盟会分子)志愿担任游击县长者,每人带三五支枪,纷往敌后组训民众,建立政权”。^⑥

对于阎锡山力图借助牺盟会的力量来坚持山西敌后抗战的情况,南京国民党政府在战争爆发不久就已经有所担心了。军统曾就此专门报告蒋介石称:“阎锡山现将公道团与牺盟会合并,同时将晋划为七行政区,每区加设政治主任一人,由绥署及省府会委,并理行政军事,以冀将整个政权分

^① 《彭雪枫给毛泽东的电报》(1937年9月18日),转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注3。

^② 《关于在山西开展游击战争的意见》(1937年9月23日)、《在山西应坚持普遍的游击战争的方针》(1937年9月29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1—22、28—29页。

^③ 《彭德怀致毛泽东等电》(1937年9月21日)、八路军总部:《关于八路军行动方针》(1937年9月21日),转见刘岩《八路军抗日战争战略部署重大变更纪实》(上、下),《党史博览》2012年第2期。

^④ 参见《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宣言》(1937年9月)、《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工作纲领》(1937年9月),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山西新军概况》第1卷,第106—107页。

^⑤ 阎锡山颁布的《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中甚至宣布说:“为了广大农民参加抗战,必须由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逐渐走上土地转公有的制度,使耕者有其田。”参见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第50卷,“附录·重要历史文件”,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17页;《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政治委员制度条例》,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第250—251页;《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的报告》(1938年2月18日)。

^⑥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5卷,第2158页;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240页。

化于地方,藉资巩固。昨今两日并将原有县长更换四十余人,新任县长以牺盟会干部占大多数,余则就公道团及理论委员会中遴选,以备操纵地方政权。其余各县长亦在准备调换中。”报告认为阎的此种做法十分可虑,因“各该团之主要干部,大都多左倾,不啻为共党建立政治基础。苟太原一旦失陷,则山西政权必立即完全操诸共党之手,毫无疑义也。目下在晋共党正在各地尽最大之努力以改善民众生活,铲除贪官污吏,改造政治机构等口号,到处煽惑民众组织民众。其用心已可概见”。^①

正如军统特务机关所注意到的,战争打响后共产党八路军进入山西境内,对民众的宣传动员重心即放在了改善民众生活、铲除贪官污吏,和主张改造政治机构方面。这也恰恰是薄一波等主持牺盟会工作以来,从县到村的动员工作所特别重视之点。

以太南各县情况为例。1937年初,在村政协助员的推动下,长治县鹿家庄村牺盟会即告成立,很快又组成了农教会。农教会一成立,就组织村民向编村村长展开斗争,要求清算其贪污罪行。尽管抗战很快爆发,县长聂士庆依然站在村长一边,将带头上县府告状的农民抓了起来。农教会在牺盟会成员的推动下,发动村民集体上县府请愿、示威,并且告到了县牺盟会特派员及驻县八路军工作团代表那里。经县牺盟会特派员和八路军工作团代表出面干预,最终迫使县长释放了扣押的农民,并且罢免了旧村长。这个头一开,其他一些编村的农会也迅速行动起来,发动了反贪污斗争,从而罢免了一批旧村长、村副。^②

同样,潞城县五里后编村村长郝文轩及秘书刘日瑞长期和村民关系紧张,但因受到县长吴明东撑腰,一般农民始终奈何不得。1937年七八月间,牺盟会特派员到潞城,进而来到五里后发动群众,很快就引导农民展开了反对郝文轩贪污的斗争。县长照例出动警察给郝撑腰,而牺盟会特派员则调来自卫队赶走了警察,公开游斗了郝文轩。此例一开,吴明东威信全失,不得不挂冠而去,薄一波等顺势呈报了新的县长人选,经阎、梁批准,潞城县自此便控制在牺盟会左派的手中了。^③

又如太南壶关、长子、阳城等县,牺盟分会的牌子刚一挂出,就提出了实行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反对土豪劣绅、改造各级政权的任务。有的县政府改造后,直接在农村推动了“借粮”“抽地”“废文约”和“反贪污”斗争,并斗争了部分富户,撤换了有贪污行为和坚持搞摊派的村长、村副。有的县还废除了田赋,用“合理负担”的名义,根据土地财产收入等,将各编村30%的富裕农户分为十等,地富归为一至五等,其他富户归为六至十等,大地主划为特等,十等富户由编村按筹粮筹款,定征抗日经费;特等富户由县政府直接下达粮款数,从而使70%的贫困农民免去了负担。此举自然在很大程度上为牺盟会左派在底层民众中赢得了声誉,扩大了号召力。^④

到1937年11月上旬太原沦陷前后,牺盟会中左派力量已经在晋东南夺取了陵川、屯留、潞城等若干县的县长职位,改造了这些县所辖的大批区、村级政权,以及公安局和公道团等机构或组织。到1938年底,太南不少农村已经建立起中共支部。像壶关县已建立中共党支部24个,发展党员445名;潞城县共建立了中共党支部15个,党员发展到了1000多人;长治多数自然村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全县发展党员约4000人。^⑤

① 《戴笠致南京蒋委员长电》(1937年10月2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6036725。

② 鹿保生口述,张怡珍整理:《峥嵘岁月——鹿保生同志在长治县革命活动纪实》,《城区党史资料》第3辑,中共长治市城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1987年编印,第54—55页。

③ 甄成柱、靳伟:《潞城早期革命活动的开展》,《长治文史资料》第9辑,长治市政协文史处1991年编印,第83—84页。

④ 武天祥:《牺盟会潞城分会》,《长治文史资料》第4辑,长治市政协文史处1988年编印,第12—13页;王贵祥、武发好:《张恒业与壶关党的早期活动》,《长治文史资料》第9辑,第69—70页;李引红整理:《牺盟会在阳城活动始末》,《阳城文史资料》第12辑,阳城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2000年编印,第216—220页。

⑤ 王贵祥、武发好:《张恒业与壶关党的早期活动》,《长治文史资料》第9辑,第76页;甄成柱、靳伟:《潞城早期革命活动的开展》,《长治文史资料》第9辑,第85页;张苏斌:《坚持长治地区对敌斗争的回顾》,《城区党史资料》第3辑,第45页。

显而易见,抗战开始后,牺盟会一度顺利发展并有相当激进的表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山西抗日的现实需要迫使阎锡山相信,非放手群众运动并采取激进政策不可。这种情况正好适合于薄一波等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通过牺盟会,直接在县以下推行一些比较激进的政策主张,同时发展扩大决死队。^①

当然,阎锡山的放手和激进,是想要借此保持自身力量在山西的存在,并最大限度地巩固自己对山西的实际控制。一旦他发现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能实现他的目的,反而便利了共产党八路军,使山西许多地方,特别是大量青年和民众有可能脱离他的实际控制时,他是注定会采取行动来夺回这种控制权的。

阎锡山与中共关系的变化

(一) 牺盟会左派与阎锡山裂痕初现

牺盟会中左派势力最先取得实际控制权的地区,是晋东南太北各县。一方面,这是因为1937年11月薄一波出任了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主要统辖太北各县;一方面,是因为八路军一二九师这时亦开入太北地区活动,并有计划地开始在太行创建根据地。

无论薄一波等人,还是一二九师,这时大多贯彻的是抗战初期毛泽东和北方局书记刘少奇要求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民众的指令。

自八路军出动抗日以来,毛泽东和刘少奇就一致提出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争取民众和发展军队上面。毛泽东明确主张:“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只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为此,目前“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②

太原失陷第二天,毛泽东更进一步提出:“各军大溃、阎亦无主,红军应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人民,废除苛捐杂税,减轻租息,收编溃军,购买枪支,筹集军饷,实行自给,扩大部队,打击汉奸,招纳左翼,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③

刘少奇的指示更为具体。他在10月上旬就以北方局的名义发布指示称:“我们赞扬阎锡山氏及其他许多华北地方当局对日抗战的决心,然而我们不能不坚决反对他们压迫、阻止与统制包办群众救亡运动的自杀政策。”对统治者压迫统制群众运动的政策表示让步,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如果统治的当局真正愿意去发动群众时,我们应该援助他们,和他们共同去动员与领导群众,但当统治者并不愿意发动群众,而且用尽一切方法来压制、统制群众时,那我们就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群众,必须动员群众反对统治者的压制与统制”。他还特别强调要用经济口号和经济斗争来动员群众。要帮助工人增加工资、建立工会、实现应得的福利;要提出农民的要求条件,“普遍减租百分之二十五,佃六主四共分收成(照各地情形提出),减息到一分以下,减少对穷人的捐税摊派,增加雇农的工资”等;说“要使群众的经济斗争与抗日救国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统一起来,让工人农民吃

^① 关于牺盟会中不存在中共组织系统,薄一波等人多采取单线和地下碰头的方式个别向北方局汇报请示重大问题的特殊工作方式,可参见薄一波《七十年的奋斗与思考》(上),第208页;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180—181页;牛荫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纪略》,《山西文史资料》第15辑,第74页,等。

^② 《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③ 《毛泽东关于大力发展群众武装问题致朱德等电》(1937年11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99页。

饱饭好去救国!”坚决反对任何限制工农经济斗争的法令和做法。^①

中共地方干部长期从事群众工作,执行北方局指示,提出经济斗争的口号,对他们来说毫无困难,事实也证明这是最容易立竿见影地动员底层贫苦农民的一种重要策略。至于在新的统战形式下,普遍实行这种做法是否会激起新旧对立、贫富对立,甚至于阶级对立,妨碍到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执行,他们这时多半并不特别担心。因为北方局的指示是,必须坚决反对统治阶级任何限制工农斗争的做法,否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凡是牺盟会左派掌权的地方,对当地原来的县、区、村领导人,常常会采取一种比较激烈的态度,如惩罚性地支使后者干这干那,或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批评羞辱。即使是薄一波,对旧派人物也“完全采取一种打击的态度”。如第三行政区某县、区政府官员,因无法接受牺盟会特派员的训斥和要求,向专员公署呈文要求辞职,薄马上就签字批准。注意到毗邻的第五行政区政治主任续济川思想陈旧,牺盟会左派工作发展受阻,薄便乘日军侵入该地区,几个县政府垮台之际,先斩后奏,越权委派了县长,然后才报告阎、梁说:“他(指续济川——引者注)不派人负责我已经派了。”^②

同样的情况,高度重视农民动员、农民斗争的结果,是农会组织建立发展很快;但强调经济斗争的结果,在农村中事实上多半只能助长放任自流的斗争倾向。常常是“农会一成立,大多就找村长、区长算账”。由于多数区长和村长过去派粮、派款都有不均,甚至从中贪污的情况,组织起来的农民一旦被引向经济斗争,就难免会算到好几年以前去,结果多数区长、村长不仅都被打了下去,而且都成了农会的死对头。除了反贪污一项外,农村中的其他经济斗争,无论是合理负担,还是减租减息,多数农会都坚持不负担或要求减一半,甚至要求100元以上的债本息不还,要求和尚的租一律不交。凡是村长不赞同的,农会往往直接代行村长权力,自己变成了一级权力机关,逼迫富户和债主照此执行。^③壶关等县的牺盟会还发起了“借粮”“抽地”“废文约”“管煤窑”等项运动。抗拒的富户被斗争,反对的村长被罢免。^④高平县有的村的农会会员背着锅到富人家去做饭吃,有的村的穷人拿不到赔罚款,就把守水井,不让富人吃水。陵川县有的村因搞借粮斗争,逼得人跳井自杀;平顺县有的村把村长捆起来,逼其摆席请全村吃饭谢罪。有些牺盟会的干部排斥且仇视公道团,有些公开宣传分富人的粮食,或总想找富人的错,好没收他们的财产。^⑤

按照大卫·古德曼(David Goodman)所做的考察,这一时期晋东南这类激进的变革还有很多。像大搞阶级斗争,要求废除私有制,和着手进行土地改革等情况,在不少县区甚至是从上而下,在干部和上级党委默认的情况下发生着。因此,很难认为这些情况只是偶然出现的。^⑥应该说,在抗战爆发之初,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行之初,这也是很难避免的。

这是因为,新的形势和新的政策并不能一下子改变多数干部在苏维埃革命期间形成的思维观

^① 刘少奇:《为发动华北广大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而斗争》(193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第82—85页。

^② 薄一波:《克服错误,树立统一战线的新工作方式》(1938年),《薄一波论新军》,第193—194页;《杨尚昆关于晋西南党的工作及山西一般情况向刘少奇的报告》(1938年6月3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第108页。

^③ 《刘少奇、杨尚昆关于山西工作情况向张闻天的报告》(1938年2月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第85页;《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的报告》(1938年2月18日);《中共冀豫晋省委建立太行根据地会议报告》(1938年3月20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143页。

^④ 王贵祥、武发好:《张恒业与壶关党的早期活动》,《长治文史资料》第9辑,第70—71页。

^⑤ 晋豫特委:《晋豫边区党过去三个月工作的总检讨与目前的具体工作》(1938年4月19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181、183—184页。

^⑥ 大卫·古德曼著,田西如等译:《中国革命中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263页。

念和工作方法。而且,新政策的提出,原本也没有脱离共产党人既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基础,因而各级干部多半更习惯于把它看成是新形势下党的斗争策略的一种灵活调整。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到其下属各级领导机关,对统战目标及其政策运用的理解,多半也都还是阶级斗争式的。对统战工作,他们首先容易想到的,还是如何巧妙地与统治阶层或中间势力争夺群众来壮大自己,独立自主,在双方关系破裂前,“利用这个机会得抢一把就一把”。^①

这也就难怪,山西省委及冀豫晋省委^②这时对基层组织的民众工作要求,有些甚至和苏维埃时期没有太多区别,依然是:对一切反动势力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如民团、保安队、佛教会、民主堂、救世军、合作社等,应“争取其下层,反对其上层,驱逐其领袖”。^③包括对蒋介石、阎锡山军事上的失利,许多领导干部也习惯于抱以一种蔑视的态度,强调中日战争的新局面“只有我们党和八路军才能担负起来”。^④

一直到1937年12月之前,北方局、山西省委和冀豫晋省委其实都具有这种倾向,这就不能不对晋东南基层党组织,特别是身处牺盟会中地位微妙的秘密共产党人产生很大影响。这也是牺盟会左派常常表现得十分激进,每每容易引起阎锡山、梁化之以及山西旧派军人和政客的怀疑,甚或反感的一个原因。

(二)中共谋求与阎锡山建立模范统战关系

把独立自主地发展部队和发动农民斗争作为新形势下统战工作主要任务的这种做法,在1937年12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于当时王明等人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来了共产国际新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于12月9—14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抗日高于一切”和争取实现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并“共同建国”的政策主张。^⑤会议对前一段的统战工作做了自我批评,承认:“我们地方工作同志某些幼稚行为,最近引起不少与晋绥军及地方政府的摩擦。”会议要求各级党政军领导人在统一战线区域内的一切地方工作、群众工作和扩军工作,均应尽量取得友党友军及地方政府的同意与合作;提出:对方“万一不能同意时,不应勉强,而应暂时让步”。一切可能引起摩擦的做法,均应极力避免。^⑥

可以肯定,毛泽东深知在山西搞好与阎锡山的统战关系以及协助晋绥军抗日的重要性。因此,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过“必须坚持与阎合作”和要“援助晋绥军不使过于损失力量”的观点。^⑦但是,十二月会议前,由于国民党军队全面失利,毛泽东认定当时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不相信阎锡山、蒋介石的战法能阻止日军推进,因此对保存红军仅有的实力看得比较重,对阎锡山及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尚未十分重视。^⑧

十二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后,毛泽东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明显地改变了此前的倾向,于会前会后接连向部队发出一系列加强统战工作的训令。他明确提出:“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① 《中共冀豫晋省委建立太行根据地会议报告》(1938年3月20日),山西省档案馆藏:《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152页。

② 1937年10月由中共平汉线省委所属的平汉线以西、正太路以南地区,与山西省委领导的晋中、晋东南等地区党组织合组而成。

③ 转见《目前形势与我党的任务——北方局来信》(1937年11月30日),山西省档案馆藏:《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49页。

④ 参见冀豫晋省委《目前军事发展的形势及我们对××区组织问题的提议》(1937年11月1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37页。

⑤ 转见任弼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1938年5月17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3—314页。

⑥ 《朱德等关于减少摩擦巩固抗战团结的训令》(1937年12月18日);《毛泽东等关于在友军区域内应坚持统一战线原则的指示》(1937年12月24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39—741、763页。

⑦ 《关于敌情判断及八路军的战略部署》(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5—17页;《张闻天、毛泽东关于在山西必须坚持与阎锡山合作问题致周恩来等电》(1937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第72页。

⑧ 关于抗战初期毛泽东反对出动全部主力上前线,主张部队应分散发动群众,不以打仗为主,强调作战必须坚持山地游击战原则,反对集中作战,一度不同意去平原,不同意去敌后,不同意脱离山西进入河北敌后等,都反映了他最初在军事上极度谨慎的态度。相关文献可参见《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和《八路军(文献)》等收录的毛泽东1937年7—10月的各种电文。

政策,八路[军]对华北各友军尤其对阎及各县地方政权、地方绅士,必须保持好的友好关系,一切须求合法与统一,减少摩擦,团结对敌。”考虑到阎锡山及晋绥军将领对八路军擅自扩军筹粮的做法日渐不满,开始明令禁止各部队就地筹粮筹款,毛泽东还专门电示八路军和北方局,提出:“目前部队扩大甚快,枪饷两缺,且与阎方发生严重矛盾,亟应停止扩大,收回部队驻各处之八路军工作人员。一切须在统一与各部范围内工作,一切须取得阎之同意。”^①对此,八路军总部亦马上下达指示,要求各部队:“检查与纠正我们某些左的急性病与幼稚,甚至违反路线的行为”;“十二月底停止扩兵突击……以后只在驻地附近做招兵工作,组织游击队”。^②

刘少奇也参加了这次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并接受了会议的政策主张。会后,他还主动提出:“我们与阎百川先生的统一战线要使之成为全国的模范。”^③

1938年1月初,回到北方局的刘少奇即开始部署落实中共中央的新的指示精神。此前,基层组织在决死队中党员发展过快,一度几乎达到十分之一,不仅无法守住秘密,而且与旧军官的对立冲突几近白热化,两名中共秘密党员因此身份暴露而被捕。鉴于此,北方局这时专门下达指令,要求各级党部立即“停止在山西军队中党的组织活动,以后情况允许时再说”。^④

2月上旬,刘少奇与杨尚昆联名向中央就北方局此前的统战工作做了总结报告。报告特别检讨称:阎锡山是要抗日的,许多进步的事,如废止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组织武装,训练群众,都是做的。但“因为八路[军]的招[扩]兵行运动、农民斗争以及阎之左派在行动[上]的过左行为,曾经引起了许多纠纷,引起了地主及旧派相当大的反感,再加以托派汉奸的挑拨,使我们与阎之关系已经发生某种部分的裂痕。阎有几道命令向我们警戒,如改游击队为自卫队,并限制自卫[队]的数目,禁止一切部队筹粮筹饷,下令取消农民会(后来又收回成命),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仅以晋绥军为限,并怀疑牺牲[盟]中的工作人员与我们有关系,逐渐有不相信牺盟的表示”。包括决死队中政工人员过去极端幼稚的和关门主义的做法,使得原本就落后的军官们与政工人员尖锐对立,影响很大。刘说明,自十二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北方局已经传达了中共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并在各方面进行了一些重要的转变,情况正在好转中。^⑤

1938年最初几个月,北方局下属各级党委几乎都依照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新的统战方针,对前期工作做了检查。在此期间,北方局对牺盟会过于左倾激进的表现有过不少尖锐的批评,这甚至影响到了北方局对牺盟会性质及问题的基本判断。这种判断或认识至少一直延续到了1939年夏秋,亦即晋西事变之前。当时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在晋冀豫区第一届党代会的总结报告中仍旧公开地对牺盟会的工作表示很不满意。他在会上断言:“牺盟是小资团体,在困难前好[毫]无勇气。”他甚至告诉与会者:“有人问我对牺盟关系,答:‘抗日关系’;对他态度?帮助。”^⑥

^① 《毛泽东关于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致小平、子华、雪枫并告朱彭任等电》(1937年12月17日)、《在友军区域内必须坚持统一战线原则》(1937年12月2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30—131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页。

^② 《关于减少摩擦巩固抗战团结之决定》(1937年12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33页。

^③ 刘少奇:《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提纲》,1937年底油印件。

^④ 《王稼祥关于晋西北工作的报告》(1939年5月4日);《刘少奇、杨尚昆关于山西工作情况向张闻天的报告》(1938年2月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第85页。

^⑤ 《刘少奇、杨尚昆关于山西工作情况向张闻天的报告》(1938年2月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第81—85页。

^⑥ 《杨尚昆在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1939年9月28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2卷,第588页。

自抗战以来在统战工作上出现的种种情况,肯定不只是牺盟会本身,也不只是牺盟会中担任领导工作的少数共产党干部自身的问题。中共晋豫区党委1938年春的报告中对此说得相对比较客观。它指出:自抗战以来,从事上层工作的中共干部及牺盟会新派人物,对统战的理解往往是片面的和只着眼于工作关系。多半“只知道上层统一战线,不知道下层统一战线,只知道国共合作,不知道争取地主资产阶级,忽视争取地主资产阶级参加抗日”。^①也就是说,在上层工作时多不能不重视统战问题,而一到基层,就很容易地把“把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变成土地革命,或消灭地主富农”的阶级斗争了。^②

“合理负担”是阎锡山提出来的。用他比较直白的说法就是:抗战要“有钱出钱,大家出力”,“赚钱多的应该多负担,财产多的应该多负担,得利钱的应重重负担”。^③此一政策的提出,无疑照顾到了贫苦农民,按照钱多钱少多把主要负担摊派到了农村富裕人家,对动员农民大多数,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农户财产多少或靠自报,或靠村长组织评定,甚至干脆交由农会去评定,政府当时对农户资产、收入、地亩、债务,乃至土地分类等等调查、计算,既难于调查,也定不出具体标准及操作办法,在村中贫苦农户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结果就是把负担弄到极少数人头上去了。所谓“合理负担”,实际各地只有三分之一的农户要负担。^④这边把负担都加诸在很少数的所谓富裕农户的头上,那边又大搞废除苛杂、减租减息和反贪污追赔罚的斗争,不仅使不少基层农村关系紧张,与旧派政府及军队的关系也很紧张。这除了影响到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外,也极大地影响了新派及八路军控制的政府的财政收入。^⑤

因此,十二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政策调整,很容易地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军负责机关的认同。从1938年初开始,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导下,山西各地八路军和党组织,也包括牺盟会左派干部,都开始按照新的政策方针,调整对阎锡山及其旧派势力,以及对农村中富户的态度和做法。只是,这一进程并未能完全落实到位。因为1938年二三月间日军第一军对山西南部展开“平定”作战^⑥,中共及其新派与阎锡山及其旧派的关系,很快又紧张起来了。

(三) 中共组织大发展与统战危机再起

日军进攻前,驻在晋东南的国民党中央军及川、滇军各部有20万人左右,八路军只有总部特务团、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和一二九师一部,不过1万余人。基于军事上对日作战的需要,当时阎锡山将山西境内的部队分成了北、南、东三路军,傅作义率北路军在汾阳、离石以北;卫立煌率南路军在

^① 《晋豫边区党过去三个月工作的总检讨与目前的具体工作》(1938年4月19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181页。

^② 《中央关于建立与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1940年11月1日),《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等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③ 参见宋劭文《关于县村合理负担的商榷》,《抗敌报》,1939年3月18日,第2版;戎子和:《晋冀鲁豫边区财政工作的片断回忆》,《财政》1984年第4期。

^④ 中共这时各根据地这方面的负担情况也基本差不多,都是负担率差距太大而负担户太少的问题,最少的甚至只有10%,最多的不过50%。相关情况可参见唐致卿《山东抗日根据地合理负担政策述论》,《齐鲁学刊》2000年第5期;柳敬和:《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减轻农村负担政策简析》,《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周祖文:《“不怕拿,就怕乱”:冀中公粮征收的统一累进税取径》,《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3期;等。

^⑤ 参见彭真《彭真在中共冀豫晋省委活动分子会议上的结论》(1938年2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112页;《太南工作巡视总结》(1938年10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459—460页;李引红整理:《牺盟会在阳城活动始末》,《阳城文史资料》第12辑,第216—220页;王贵祥、武发好:《张恒业与壶关党的早期活动》,《长治文史资料》第9辑,第69—71页。

^⑥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页;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页。

吕梁山脉；朱德率东路军在晋东南的榆社、辽县地域。

由于日军对晋东南的进攻基本上沿着主要交通线展开，没有遭到中方的全面阻击，因而很顺利地占据了晋东南几乎全部铁路、公路交通要道及其附近的县城，中方守军主力则分别撤退到了太行山和中条山脉的大片山地中。这时，毛泽东等敏锐地注意到了在晋、冀、豫三省交界的太行山脉南麓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以便接通晋察冀根据地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如此大量的国民党军队是很难在晋东南长期坚持下去的，冀豫晋交界的敌后农村完全可能建成像晋察冀边区那样新的根据地。中共中央因此提出，晋冀豫边现在友军还太多，但我仍应加紧发展许多小的区域，八路军应向晋西北、晋西南分别派三四个支队。为创建冀晋豫边根据地，向晋东南则至少应派出七个支队去进行活动，以便大部友军走了之后可以马上就能着手实施。^①

1938年2月底3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就当时形势做出决议，特别强调提出了大力发展党的组织的问题。称“我们党今天在数量上还远不能适应抗战事业的需要”，必须“大量的千百倍的发展党员”。^②3月24日，张闻天、毛泽东和刘少奇据此联名向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发出指示，要求地方党和军队乘机在冀晋豫“大大发展党，建立与健全各级党的领导机关”，争取逐步改造当地政权机关，“以最快的速度创造冀晋豫边区”。^③4月5日，张闻天和刘少奇又联名致电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和冀豫晋省委，提议通过薄一波，直接要求阎锡山同意设立冀豫晋临时行政委员会，召集民众代表会，建立人民自卫军，“改造那些坏的区村长”，以便创造冀晋豫边区根据地。^④

出乎意料的是，1938年4月底，由于日军要应对徐州方向作战需要，用于晋东南作战的兵力不足，被迫“放弃了对潞安地区^⑤的警备”，将部队全部撤出了晋东南。^⑥长治等被日军一度占据的10余县城得以收复，晋东南再度回到了阎锡山的权力范围之内。这样一来，在日占区创造共产党控制的冀晋豫边区的计划一时间就无法实现了。但是，由于日军进攻期间晋东南地区旧政权大部土崩瓦解，不少县长逃之夭夭，少数留下来的也威信尽失，故中共党组织及其武装力量在晋东南的发展条件依旧十分有利。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因此坚持认为，应该乘机取得并改造冀晋豫边的各级政权，撤换那些顽固守旧且对抗新派的县长、区长、村长们，为今后控制晋东南地区打下政治基础。^⑦

自抗战开始后，晋东南只有北部大体处于牺盟会新派力量和八路军的影响下。晋东南的南部，即第五行政区，则是由阎锡山任命的续济川任政治主任。续是同志会秘书，也是牺盟会的领导人之一，却属于旧派，对薄一波等人的做法和八路军的到来，颇多戒备，政治上明显地站在山西军政高层中反对改革的旧派官僚一边。不仅如此，就是在薄一波的权力范围内，也不是每个县的旧县长都能轻易撤换的。在这些县，牺盟会左派干部过去只能从农村基层做起，每县选派数十名积极分子下到农村中去，组织农会等群众团体，发动农民斗争。真正控制在牺盟会手里的县，不过三四个而已。

^① 《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38年3月23日）、《毛泽东、刘少奇关于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的指示》（1938年3月24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166—167页。

^② 陈绍禹：《三月政治会议的总结》（1938年3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1938年3月15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186—187页。

^③ 《张闻天、毛泽东、刘少奇关于目前晋冀豫党与八路军的任务的指示》（1938年3月24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168—169页。

^④ 《张闻天、刘少奇关于建立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问题的指示》（1938年4月5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170—171页。

^⑤ “潞安地区”，这里指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长治，即旧潞安府所在地。

^⑥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83页。

^⑦ 转见《杨尚昆关于晋西南党的工作及山西一般情况向刘少奇的报告》（1938年6月3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第111页。

注意到因日军入侵和撤退,旧派地方政府官员大部溃散,中共中央毫不迟疑地做出了夺取晋东南控制权的策略部署。

5月上旬,张闻天、刘少奇接连致电冀豫晋省委实际负责人朱瑞、李雪峰并八路军总部,提出:“在粉碎敌人九路进攻后,东南目前的中心工作应是从事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因此,必须建立晋东南党的领导中心。”朱瑞及省委应立即向总部靠拢,并扩大省委机关,并应“设法使薄一波之行政主任公署与总部、朱瑞靠拢,并推动薄从事政权机关、地方武装及群众运动之改进、发展与统一”。他们同时要求透过薄一波等,以牺盟会名义,联合当地士绅,并透过与梁化之有关系的个人,向阎锡山、梁化之报告续济川在敌人进攻时逃走、搜刮民财、打击牺盟会和抗日团体等事实,坚决要求撤换续济川的第五行政区政治主任的职务。^①

按照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北方局成功地通过薄一波等告倒了续济川。阎锡山于6月正式任命牺盟会的另一位领导人,当时已成为中共秘密党员的决死三纵队政委戎子和接替了续的职务。紧接着,北方局在八路军总部朱、彭等人的极力推动下,批准已经停止多月的决死队中的党组织恢复活动。^②中共中央亦指示在牺盟会及其他一切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与政府中组织党团,以发挥领导作用。^③于是,牺盟会内秘密党员原本不得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关系的规定也被打破了。不仅薄一波主持的第三行政专署开始直接接受八路军的领导,戎子和一到第五行政专署所在地长治,也很快成立了党团组织,开始直接依据北方局和冀豫晋省委的指示行事。如此一来,假手薄一波、戎子和,经过全面撤换旧县长,“并改造那些坏的区村长”,中共意外地在晋东南取得了组织发展和政权控制的双重收获。

按照北方局的部署,薄、戎等利用牺盟总会的名义,挑选了40余名牺盟会特派员,在临汾举办了县长培训班,经过短期培训后,即通过各种方法取得委任,将晋东南几乎所有旧县长都换成了自己人。^④晋东南各级政权全面改造之际,晋冀豫区委^⑤也提出了突击发展党员的任务,层层部署了发展党员的数字。县政权一经改造,这种运动式的组织发展与洗刷各县旧区长、村长的斗争,很容易就搞得热火朝天。^⑥决死队一个总队两三个月时间就补充了上千新兵。^⑦中共地方组织的党员人数2月还只有1000余人,6月已经增长了近10倍,到8月初已达到1.5万人以上。9月,全区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更是猛增到了3万余人。^⑧

(四) 阎、共关系紧张与中共的自我约束

但是,从1937年初牺盟会开始在晋东南发展组织到这时,前后也只不过一年多时间。在此期

^① 《张闻天、刘少奇关于建立晋东南党的领导中心给邓小平等的电报》(1938年5月4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291页;并转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215页。

^② 《朱德、彭德怀、朱瑞提议恢复决死队党的组织的活动致中央书记处等电》(1938年3月28日)、《刘少奇关于中共中央北方局解散决死队内党的组织问题复朱德、彭德怀、朱瑞电》(1938年3月30日),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山西新军概况》第1卷,第129、130页。

^③ 《张闻天、刘少奇关于在牺盟及其他一切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与政府中之党员均须组织党团致朱瑞电》,(1938年6月),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山西新军概况》第1卷,第148页。

^④ 参见戎子和《我在五专署时期的几点回忆》,《长治党史资料》第1辑,中共长治市委党史办公室1982年编印,第30—36页;戎子和口述,王雷平整理:《五专署工作情况粗忆》,《长治党史资料》第4辑,中共长治市委党史办公室1983年编印,第34—45页。

^⑤ 1938年8月由冀豫晋省委改成。

^⑥ 王琳:《抗战前期我在长治县委》,《城区党史资料》第3辑,第40—41页。

^⑦ 安晋:《决死六总队在晋东南活动片断》,《长治党史资料》第2辑,中共长治市委党史办公室1982年编印,第40页。

^⑧ 《中共冀豫晋省委给北方局并中央的总报告》(1938年6月22日)、《中共晋冀豫区委会议记录(一)》(1938年8月15—18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245、308页。另见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1937—1949)》,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太南工作巡视总结》(1938年10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460页。

间,除大量依托牺盟会成长起来的本地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以外,晋东南中上层干部多来自外地,一部来自北方局系统,一部来自八路军系统。形式上冀豫晋省委成立后,与薄一波领导的牺盟会有一个区域划分,辽县以北归冀豫晋管,以南归牺盟会管。实际上,牺盟会中的党员处于秘密状态,其组织发展与党组织发展不完全重合,再加上中共地下党、八路军进入晋东南各县有早有晚,组织发展原本即各行其是,故当地党组织领导关系仍旧十分复杂。1938年春组织大发展运动一来,此一界限又被打破,基层组织有受山西省委领导的,有受冀豫晋省委领导的,有受八路军工作团、办事处领导的,也有双重领导的。在第三行政公署下辖的各县,党组织、武装团体和民众团体,因领导关系隶属不清,以及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关系不睦,这段时间也是矛盾和冲突不断。^①

当然,这时对晋东南形势影响更大的,还是中共党政军各级干部在统战工作上的“左”倾表现。据晋东南党的领导机关这时报告称:一些地方组织“对上层不知争取,采取对立甚而打击”;对基层又“不知争取地主富农”,只重视经济斗争,致使上层新旧对立,基层贫富对立,情况“非常严重”。^②牺盟会员在农村中做了大量宣传和组织的工作,但“强制组织包办甚至代替群众团体,代替政权,强迫实行合理负担等倾向普遍存在”,“农会、妇会,许多地方还是极端空架子,群众根本不了解农会、妇救[会]是什么”。特别是晋东南,山地多,“人民生活很苦,文化程度极落后”,宣传抗日和发展党组织都很困难。因为生活苦,每年都饿死人,许多农民“虑及家庭生活之困难,不能积极起来”;因为文化程度低,许多农民不了解日本人有什么不好,对“抗日”没有兴趣。^③表面上好像建立了不少农民团体,实际上当地的群众工作还“没有坚固的下层基础,只是团结了一批青年干部”而已。^④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也指出,经历了1938年春天日军对晋东南大扫荡,可以清楚地看出,牺盟会的工作很多还“是空架子”。就连本应承担抵抗任务的决死队,因作战能力欠缺,几乎不能对日作战,有些部队甚至于“不打自散”。建立新军本来就会造成新旧两派关系紧张,决死队这次的表现,更成了旧派势力激烈抨击新派和新军的一个重要口实。^⑤

由上可知,在北方局等领导机关看来,由于政策掌握不当,1938年春夏对日作战的胜利和晋东南党组织大发展、对县村政权的大改造,对党与阎锡山的统战关系,明显存在着利弊参半的情况。

从利的角度,不论农民动员组织的实际程度如何,不少农民对抗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较前有了某些了解,不像过去那样是非不分,是肯定的。比如,有报告就明确举例说,在此之前,高平一带的农民中就普遍流传着一种看法,即:“从前说共产党红军杀人放火,其实八路军很好;现在又都说日本人怎样厉害,也许日本人来了比八路军更好。”经过日本人三个月的统治,亲眼目睹了日军奸杀抢掠的暴行后,不少农民心态发生了转变,对能打仗的八路军有了依靠的心理,而且“参加抗日部队与游击队特别踊跃”。^⑥

而从弊的角度,由于牺盟会,包括共产党在农村中的组织发展工作并未形成可靠基础,靠这种

^① 此种矛盾冲突有时甚至会发展到武装冲突的程度。如1938年春因为榆社县长的任命问题,牺盟会就曾用决死队驱逐了晋中特委领导的游击队。

^② 《中共太原特委关于太原工作历史的总检讨》(1938年10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446页。

^③ 《太原工作巡视总结》(1938年10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460页;《晋豫(即现晋东南特委)1、2、3月份的报告》(1938年4月),李茂盛等主编:《太岳抗日根据地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

^④ 《刘少奇、杨尚昆关于山西工作情况向张闻天的报告》(1938年2月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第86页。

^⑤ 《杨尚昆关于晋西南党的工作及山西一般情况向刘少奇的报告》(1938年6月3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第105页。

^⑥ 《晋豫边区党过去三个月工作的总检讨与目前的具体工作——晋豫特委活动分子会议上的结论》(1938年4月19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188页。

运动式的半强迫的组织发展方式创立起来的政权和组织,问题多多,也是肯定的。因为在部分农民的政治热情被调动起来的同时,存在着许多问题,并且还使统战关系出现了新的危机。

以长治县部分农村这时共产党组织发展为例。1938年2月长治只有中共党员55人,经过五六月大发展增长了十几倍,到1939年初竟达到1500名之多,全县61个编村据说都有了党员。^①而后来的调查报告却指出:1938年的突击发展问题多多。当时许多区村发展党员搞竞赛,“不仅支委可以批准入党,党员个人也可批准,出问题,批准者不负责任。在入党条件上也自行减低,只要抗日愿意,说八路军(好)……皆可入党。”结果,“原村一投机份子曾介绍七个闾长集体入党……鲍村七闾人家,一个月能成立三个支部,每个支部党员均在数十名以上”。但绝大多数农民对此并无清楚意识。“有的入了党不知道自己是党员,或知是党员而不知参加的是什么党,……认为农会就是共产党者也不少”。多数入党的农民完全没有共产党的概念。有被发展入党的农民问介绍人:“咱们为什么不烧香呢?”报告称:“究其入党动机,一部分是为了维持地位,为了有势力和有事干,为了反对老财等。大多数是不知为了什么。”^②

让中共中央这时开始感到不安的,是如此大规模地,甚至是大张旗鼓地在山西境内,特别是借助牺盟会打出共产党的旗帜来,即使组织者“严格将公开与秘密职务分开”^③,也会再度刺激阎锡山,从而使年初以来曾经努力修补过的统战关系又受破坏。

事实上,自日军退出晋东南之后,新旧两派,包括阎锡山旧军与八路军之间的摩擦冲突就已经在日渐升温并尖锐化起来,“已有一些党员因关系暴露被捕,队伍被缴械,机关被解散”。如高平县牺盟会秘书及中共高平县工委负责人遭到杀害,中共中央已经发出过告诫。^④

这一年6月底,注意到情况愈趋严重,牺盟会上层一些秘密党员的身份可能暴露,时任北方局书记的杨尚昆特别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务必“严令各地注意秘密工作,所有上层同志,绝对禁止发生横的关系,绝对禁止[留有]与组织有关的各(文)件”,并应立即“纠正牺盟工作各种突出现象和工作方式”。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接电后极为重视,接连下达指示给朱、彭和北方局派在晋东南负责冀豫晋工作的朱瑞等称:“因为党的组织在山西有很大的发展,以及组织方式、工作方式上的缺点,党的秘密已经很难保持”。一旦我们在山西新势力中的组织暴露,必然会损害我们与阎的统战关系。故指示明确要求,为减少阎的怀疑,在已经发展较多的地方“暂时停止发展党员,特别在牺盟系统中暂停发展”,更“不要一般地对下级号召大大发展党员”。不能用当政者的态度和方式,公然去指挥牺盟会、决死队等。牺盟会等必须保持阎锡山色彩,使阎的思想看起来受到尊重。故牺盟会的一切文件口号,“须特别注意形式,多用阎之按劳分配主义的术语,少用我们马列主义的术语”。^⑤

^① 《晋豫(即现晋东南特委)1、2、3月份的报告》(1938年4月),李茂盛等主编:《太岳抗日根据地重要文献选编》,第54页;王琳:《抗战前期我在长治县委》,《城区党史资料》第3辑,第41页。

^② 长治县委:《党和群众工作总结材料》(1943年5月)。实际上,1938年任中共冀豫晋省委书记的李雪峰当时就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了。他指出,很多党员只是“把党看成会门,没有政治觉悟,只认为党是有势力的”。《李雪峰在中共晋冀特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1938年7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286页。

^③ 冀豫晋省委:《新形势下省委工作的新任务》(1938年6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216页。

^④ 《毛泽东等关于山西旧派的反动活动和党的对策致贺龙等电》(1938年5月14日),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山西新军概况》第1卷,第1146—1147页;《刘少奇给彭真等的信》(1938年7月10日),转见《华北工作座谈会》,1945年8月油印件;《杨尚昆关于晋西南党的工作及山西一般情况向刘少奇的报告》,《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第104页。

^⑤ 《杨尚昆关于阎锡山的动态及巩固山西统战工作的意见》(1938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第129—130页;《毛、洛、胡关于应多说阎锡山的话减少阎的怀疑致朱、彭等电》(1938年7月14日)、《刘少奇给朱瑞并冀豫晋省委的指示信》(1938年8月18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关于巩固山西统战工作的指示》(1938年7月5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335、278—279页。

阎、共关系破裂及其再妥协

(一) 阎锡山全面右转与中共的强硬应对

这个时候再来修正下层的统战政策与工作方式,显然有些迟了。阎锡山政治根基全在山西,不仅坚持独大,且还是二战区司令长官,共产党的八路军及其根据地政权都在其领导下。抗战不过一年,晋绥军损失过半,其统治范围只及部分山区农村。相形之下,中共已经开始自信:“共产党在今天已形成为华北最大党,八路军也成为华北最大的军队。”^①这种情况与阎锡山的希望落差实在太。阎当初推动成立牺盟会,创办决死队,发展新军,就是想在対日战争中尽可能扩大自己的力量到全民,以保持自己势力最大。如今,却渐渐看出决死队相当部分可能不在自己手里,仅此一点就不能不让阎锡山慢慢警觉并紧张起来了。

1938年夏,阎锡山两度在吉县古贤村召开高级军官和文职干部会,听见许多批评决死队和薄一波的说法,还不以为然。因为他这时还相信薄及其决死队,因而在会上仍旧在为薄辩护,并替决死队讲话。^②到1939年1月下旬,阎基于新军发展顺利的估计,雄心勃勃地再提要建30万铁军的设想。其口号、方针仍旧是照决死队的模式,强调要靠“与民合作,军民打成一片,处处得到人民的帮助”,“要扫除军队一切积弊,官兵打成一片”,“为国家民族负一部分责任”等。^③但随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关于防共、限共的秘密文件下达后,阎锡山对山西的形势估计,包括对决死队内部情况的看法,就开始变得不那么自信,甚至于有心要限制新派,想要把依靠重心更多地放到旧派势力一边来了。

1939年3—4月,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山西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首次批评了决死队中的政治工作和牺盟会的行政区专员随意撤换县长的做法。在半年前召开的吉县会议上,他还批评反对决死队和薄一波的旧派干部说:“这次会议是给你们开追悼会的。”“你们反对新军,反对薄一波他们,你们算什么?薄某人是大骡子拉马车,轻松得很,你们这些人哪个能赶上他?哪一个够格?”但这一次,他却突然提出必须要把行政职务与军事职务分开,“取消专员兼任政治委员”。此举对薄一波等原有的军政领导地位,无疑是致命的。放弃专员职务,即会丧失对专区的行政控制权力;放弃决死队政治委员职务,即丢掉了对军队的领导权,靠行政权力控制地方也会变得十分困难。由于阎坚持“文官不能兼任军职是蒋委员长的决定,只能执行”,薄一波等反对无效,只能敷衍塞责,表示回去再做工作,实际上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经公开化并很难调和了。^④

秋林会后,阎锡山“手谕牺盟暂停发展,各行政专员权力予以缩小,不准再自由委派县长,各行政区派保安副司令,遴选正规军团长充任,负责指挥及训练各行政区保安队,减少各专员之军权”。^⑤并且下令将决死队改编为独立旅,政工人员必须服从同级军官,并要求民运工作人员均须调往秋林行营轮流受训。他还通过报请重庆,请中央政府出面下文的办法,打算取消战委会,或是挤走战委会中的八路军代表,夺取战委会所属的游击支队。^⑥

① 《中共晋冀豫区委员会记录(二)——朱瑞总结》(1938年8月24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320—332页。

② 参见薄一波《七十年来的奋斗与思考》(上),第270页。

③ 阎锡山:《对晋绥军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学员训话——我们的集体企图》(1939年1月31日上午),《阎司令长官抗战复兴言论集》第1辑,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侍从秘书室1943年编印,第50页。

④ 参见薄一波《七十年来的奋斗与思考》(上),第276—279页。

⑤ 国民党中统局编:《山西“新军”叛变之真象》,油印本,1940年7月16日,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藏。

⑥ 《王世英关于山西阎部情况的报告》(1939年5月11日);《杨尚昆关于山西时局与统战问题的一封信》(1939年6月7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2卷,第381页。

秋林会议一个月后,中共中央注意到阎锡山政治上的后退,但仍相信阎锡山与国民党中央存在着矛盾冲突,故提出:我们对国民党与对旧军不要一样看待,要利用其内部矛盾,支持新派,反对中央化。“对阎表示愿帮助巩固山西,尊重阎的领导,赞助其进步”;“对新军问题,[要]帮助新军进步,党的组织须使之短小精干,过去党员占十分之一太多”;“政权中的党员要尽可能的掩护党的发展,但不要过于暴露”。^①毛泽东这时也批示称,对阎态度的变化,要看到整个形势的复杂性,特别是“旧派的不满,新派的幼稚,中央的压力等”。他主张:“我们对阎仍须在有条件下拥阎,我意可以对他进行必要的批评。”^②

1939年阎、共关系日趋紧张,与当年国共关系及政策的变动有着密切关系。自1月下旬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推动防共、限共政策后,中共中央、北方局以及晋冀豫区委的应对策略就是主张针锋相对。得知秋林会议内容后,无论中共中央,还是北方局,自然相信两者是互相联系的,因而一致主张在全国、在山西,都“必须采取斗争,停止其上层分子动摇,促其继续进步”。^③

就在阎锡山开始采取措施限制共产党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范围和争夺对牺盟会、决死队的控制权之际,恰好中共中央得到共产国际指示,发起了反投降斗争,认定“反共即准备投降”。如此,也就进一步确定了尖锐斗争的立场,要准备应对以蒋介石、阎锡山等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投降派”的投降危险了。^④

当然,如上所述,中共中央对阎锡山的策略,到底还是区别于对蒋的。并且,它对阎的态度,也是随着形势和政策调整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整个1938年,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都相当重视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只不过,无论在任何条件下,他们对统战策略的运用,都是建立在维护、巩固和发展自身“最大”这一基本利益诉求的基础上的,并且始终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故其在斗争中求团结的态度其实是一贯的。

例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就曾接连下令,要求包括牺盟会和决死队中的共产党组织,都要保持隐蔽、低调,避免刺激阎锡山。然而,不过一个月时间,它就又在指示晋冀豫党与八路军要“大大发展党”,“争取改造友军”,“逐渐改造政权机关”,“求得军事、政治的统一指挥与领导”了。它这样快地变动方针的一个主要出发点,就是因为注意到了新的发展机遇,以为有可能“以最快的速度创造冀晋豫边区成为坚持抗战的巩固根据地”。^⑤

同样,这一年秋天,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公开主张停止在国民党内进行有组织的活动,“不组秘密党团,不收非共产党员入党”,并提出可“将加入党员之名单提交给国民党的领导机关”,表示愿以此换取国民党的信任。^⑥但不过两三个月后,由于蒋介石不接受毛泽东关于两党组织合作的建议^⑦,

^① 《王稼祥关于晋西北工作的报告》(1939年5月4日)。

^② 《毛泽东对王世英关于山西阎部情况报告的批语》(1939年5月11日)。

^③ 转见《杨尚昆在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1939年9月28日),山西省档案馆藏:《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2卷,第587页。

^④ 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07—209页。

^⑤ 《中央关于目前晋冀豫党与八路军的任务的指示》(1938年8月24日),李茂盛等主编:《太岳抗日根据地重要文献选编》,第68—69页。

^⑥ 毛泽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14日)、《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案》,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156、167—168页。

^⑦ 毛泽东的提议见《论新阶段——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1938年11月)。中共中央与蒋谈判遭蒋拒绝的情况见《陈绍禹、周恩来等关于一个大党问题与蒋介石谈判的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8年12月13日)、《周恩来关于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及意见向中央的报告》(1939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1939年1月25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154—155、183—184、192—193、202—204页。

同时考虑到党内质疑的声音和实际工作的情况,中共中央又发布极机密指示解释说:这一决定固然完全正确,“但如何实现这一决定,则应从国共两党的现有关系及各地具体情况出发,基本的指导方针应该是不损害统一战线的实际利益,同时也不损害党的实际利益”。因此,新的指示修正了前一指示,称前面的决定只是规定对国民党中央军“一般的暂时可不继续在里面发展党的秘密组织,但不应拒绝必要时个别的发展”。而且,“除国民党中央军外,党应该在各方面依照情况及过去工作经验发展组织……党决不应该在这些方面束缚自己的手脚”。^①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1939年阎锡山必欲将牺盟会及决死队重新控制到自己手下的种种措施出台后,中共各级的应对方针是可想而知的。不仅牺盟会及决死队中具有相当力量的共产党人,就是中共中央及其北方局,包括八路军总部,都必定是要坚决抵制并与之斗争的。^②

(二) 晋西事变与毛泽东应对策略的变化

1939年6月1日,北方局发出密电,要求各分局、各区委和各部队,严格注意巩固党在山西已取得的阵地,巩固牺盟会,加强对牺盟会干部的领导,反对一切反共限共的企图。杨尚昆随后解释说:秋林会议后,山西已出现明显变化:“1. 国民党部及所谓各专员区党务专员的出现;2. 专员区域的缩小(第一区宋时昌处)与权限的限制(专员不能改变县长);3. 决死队改编为独立旅,取消政委,政治工作人员服从同级军官,取消新的薪饷制度;4. 旧派李冠洋、邱仰濬等之抬头;5. 限制民众运动,民运工作人员今后将调往行营轮流受训,所谓组织百万群众,实际系变相的保甲制度;6. 取消晋西北战地动委会,企图吞并战委会的武装力量(实际上这些武装都在我党领导之下,八路军干部创造起来的)。”“这些都说明了,今后山西的环境比以前是会更加复杂起来,新兴势力可能受到限制与压迫,顽固分子与旧势力将比从前活跃,我党我军今后可能受到部分的限制与打击中,摩擦与斗争可能更多”。对此,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③

1939年7月,日军再度向晋东南发动大举围攻,并很快打通了白晋公路和长邯公路,再占了长治等县城,开始长期驻守。这种情况进一步引起中共中央对阎锡山右转目的的怀疑。9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就山西形势问题发出党内指示,要求政治上表现强硬,实际工作上则应收缩隐蔽以应对。指示称:共产党八路军必须立即开展反对投降妥协的斗争,可公开指出反共反八路“就是投降妥协分裂的准备(不应指出阎锡山的名字)”。但“新军牺盟及政权中的党的组织,必须严密紧缩,停止不可靠的分子的党员组织关系”,避免暴露而遭破坏。^④

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从1939年10月开始,中共在秋林牺盟、民青(民族青年革命团)及阎锡山属下各机关中有组织地陆续撤出了部分可能暴露和不便临时撤退的人员。薄一波领导下的决死一纵队,则于11月间采取突然的强力措施,将部队中上百名旧军官集体解送到中共设在太行山的抗大分校去强制“学习”,从而夺取了部队的军事领导权。^⑤

尽管多少有所准备,从中共中央到八路军总部对事变的到来仍然有些估计不足。就在事变发

^① 《中央关于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发展组织问题的指示》(1939年2月8日)。

^② 参见《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制止阎锡山之动摇与巩固山西统战的指示》(1939年8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1939年9月21日)、《朱德、杨尚昆、左权关于山西反妥协反投降及豫北工作的意见致彭德怀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第384—385、401—402页。

^③ 《杨尚昆关于山西时局与统战问题的一封信》(1939年6月7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2卷,第379—383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193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第384—385页。

^⑤ 参见凌云《晋西事变前夕剑拔弩张的秋林》,《炎黄春秋》1999年第12期;安力夫:《与党和人民共命运》,《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离退休干部回忆录》第2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年版,第93页;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第280页。

生前几天,彭德怀还很乐观地在延安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报告称:从五台,到北当,到太行山南脉,除八路军外,有“友军”决死队5万人,游击队约5万人。同时县以下政权绝大部分都掌握在我手中或进步分子手中,加入各种群众团体的民众达250万人之多,相当于晋察冀边区的数量,因而是比较巩固的。^①事实证明,建立在这些数字之上的力量是不那么可靠的。当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发生时,除了薄一波所部决死一纵队因驻扎在八路军太北根据地附近,且预先采取了组织措施以防范,基本上没有遭受损失,晋西北四纵队事变后防范及时,损失较小外,二、三两个纵队,特别是他们活动区域内牺盟会左派控制的县区政府,都受到沉重打击,大部垮掉了。

决死二纵队韩钧部11月28日最先与晋绥军发生冲突,梁化之马上秘密部署准备夺取韩钧兵权。韩侦知后即公开表示抗命,阎锡山转而下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消灭”之。^②激战两三周,在八路军晋西支队支援下,韩部才得以保存下部分人员,但其原先控制的晋西南区域全部落入晋绥军之手。

损失最为惨重的,是驻扎在晋东南太南地区的三纵队及其所属政权。事变中,该部几乎全部被阎锡山的晋绥军所接管。其原先所在的太南地区,即第五专区下辖的12个县府,将近10个都被晋绥军和国民党军摧毁和控制,只有专区保安司令部两个团,和游击十团的武装,大部保存了下来。该专区被捕、被俘和被害的牺盟会、决死队干部及中共党员,不少于150人,政委戎子和及纵队长颜天明等主要领导人,几乎是靠侥幸才得以脱逃的。^③

就对此一事变的处置而言,无论阎锡山、国民党,还是牺盟会、共产党,几方面都不能不顾及当时抗战大局,因而对事变采取了公开和秘密的两手策略。阎锡山于事变发生后即公开表示此系“平叛”,内部秘密通报重庆军令部,请示应对八路军介人事变的处置方针时,阎锡山明确提出两案:“(一)分份东份西,藉剿叛军名义北上,肃清共党势力。(二)就事论事,用政治方法解决。”他表示:“前者有扩大之虑,后者有养痍之虞,究以如何处理为宜,请核示。”但蒋介石对此迟迟未予答复,也未公开向八路军方面施压。^④故阎锡山只能再向重庆承诺称:在未得中央明令前,对八路军当“竭力避免冲突”,“决不以一区之事搅乱中央全盘计划”。^⑤

决死队,亦即新军方面的反应,从一开始就是按照中央军委的指令行事的。而中央军委这时主要其实是毛泽东在负责,故对此一事变的处置经过,很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个人的应变指挥风格和政策策略考量的侧重所在。

毛泽东最初得到韩钧所部决死二纵队受袭,一九六旅旅长等军官叛变,晋西南永和、太宁等县政府被摧毁的消息时,虽然看到“反新军反抗日的武装叛变可能在晋西南、晋西北再扩大化”;“晋

^① 《彭德怀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1939年11月下旬)。

^②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呈蒋委员长报告独二旅政治主任韩钧鼓动该旅一部在隰县附近叛变电》(1939年12月5日)、《第二战区参谋长楚溪春致军令部徐永昌转呈蒋委员长报告韩钧等叛变情形并请示处置办法电》(1939年12月1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3),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版,第11—12页。并见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山西新军概况》第1卷,第241页。

^③ 参见杨献珍《十二月政变前五专署的一些情况》,《城区党史资料》第3辑,第39页;戎子和:《我在五专署时期的几点回忆》,《长治党史资料》第1辑,第37页;王培仁口述,程东明、王雷平整理:《我在长治工作时的片断回忆》,《长治党史资料》第2辑,第25页;戎子和口述:《五专署工作情况粗忆》,《长治党史资料》第4辑,第44页;聂真:《在晋豫、太岳区的斗争历程》,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山西革命回忆录》第4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④ 蒋介石迟至1940年1月10日始有回电给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称:“查此次晋西部队叛变,共党否认系其策动,我为振肃纪纲,剿灭叛军,自属名正言顺。阎长官所拟一、二两案,以第一案为妥。”转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页。

^⑤ 参见《楚溪春致重庆军令部徐部长电》(1939年12月18、21、24日等),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档(四),50591、50592、50593、50594等;《徐永昌日记》第5册,第248、249、251、254页。

西南、晋西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绝不能放弃”,提出“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予以有力的还击”,但还并未估计到事变会发展到全面破裂的危险。故他还在特别强调八路军形式上中立的重要性。提出应“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八路军“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在形式上应以调[解]方式出现,阻止旧军对新军进攻,八路军暂时不要提反对叛军口号”。^①

毛泽东12月上旬对形势的估计也还比较乐观。他认为:“晋东南、晋东北两区,抗战派比投降派的实力大;晋西南、晋西北两区,投降派比抗战派实力大。”“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之枢纽,必须掌握在抗战派手里,决不能让投降派胜利”。但他相信旧军战力不强,新军有战胜的可能。故只是强调“必要时八路军应以适当力量支持新军”。^②

到12月中旬末,晋西南的形势明显对二纵队不利,同时又有报告说晋西北决死四纵队因逮捕顽固军官,也出现严重情况。据说阎已命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率部以武力解决之。^③到这时,毛泽东才下令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支队陈士渠部速向吕梁山增兵一团,“伪装或用一部伪装夹在决死队中”,协助韩钧部打击旧军。同时要求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或政委罗贵波以一人就近去帮助四纵队雷任民部掌握形势,如果新军确有失败危险时,可以有力一部伪装决死队参加战斗。但仍特别强调,“不给阎赵以口实,并在事后也不要承认我们参加了战斗”。^④

毛泽东没有想到,从12月20日开始,晋东南决死三纵队在旧军孙楚部的压迫和引诱下,也接连发生了集体叛变的情况。决死三纵队的迅速瓦解,导致晋东南大部地区迅速陷于旧派之手^⑤,这让毛泽东一时极为震怒,以至于开始在电报中大骂阎党旧军为“王八蛋”。得知八路军一部截击消灭孙楚部两营,他兴奋至极,30日回电彭德怀,怒气冲冲地宣称:“望继续用此办法消灭一切叛军叛党,或全用我军伪装或一部伪装夹在决死队中。总之,不消灭这些王八蛋,不足以寒贼胆。”他并且还要求八路军对晋西南也要如此做。称:“吕梁山增兵一团望速来,非把吕梁山之逆军逆党全部消灭决不放手。”^⑥

不过,毛泽东毕竟需要从政治的角度来衡量与阎锡山全面军事冲突的利弊得失问题。尤其是在晋东南方面发现有中央军大举介入的迹象,更让毛变得冷静下来了。^⑦而与此同时,他亦得到了决死二纵队与陈支队不得不被迫撤出了晋西南的消息。因此,就在他异常激愤地发出要八路军参战,非把这些逆军逆党“全部消灭决不放手”的指示的第二天,他的心态就开始冷静下来了。

31日,毛泽东电告八路军总部称:决死二纵队已于27日被迫撤离晋西南,中央军在晋东南参战并准备随时增援晋西南,胡宗南一师已到宜川东南,蒋、阎有“转攻晋西北,隔断华北与边区以及华北各

① 《军委毛、王关于晋西南新旧军冲突及我们的方针的指示》(1939年12月6日)。

② 《毛、王关于晋西事件之估计及我之方针的指示》(1939年12月9日)。

③ 《罗贵波关于对二〇五旅、独七旅事件发生后工作布置致中央电》(1939年12月20日),转见杨锡九《与〈120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编者商榷——关于赵承绶召开高级军事会议问题的考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45502a0100b9r1.html, 2015年2月16日。

④ 《军委毛、王致朱、彭、杨、贺关于援助新军击退旧军的指示》(1939年12月22日)、《毛泽东关于对晋西南事变的方针》(1939年12月23日)。

⑤ 到1940年1月,牺盟会原先已经掌握和基本掌握的晋城、陵川、高平、长治、长子、壶关、阳城、沁水等10县,均被孙楚及中央军夺占,县以下干部损失超过200人。《关于国民党顽固派在晋东南杀害逮捕我干部的情况通报》(1940年1月6日),军事科学院本书编辑组编:《左权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1—412、414页;《薛迅关于晋豫工作的汇报》(1940年2月10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72页;《中共中央关于山西十二月事变经过及解释方针的指示》(1940年1月28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36—39页。

⑥ 《毛、王关于非把吕梁山之逆军逆党全部消灭决不放手致德怀电》(1939年12月30日)。

⑦ 有关中央军在当地具体驻扎及介入事变的情况,可见《薛迅关于晋豫工作的汇报》(1940年2月10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65、69—71页。

个区域的联系”的目的,此举“将牵动华北全局关系全党的重大斗争”。“保持山西抗战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这是目前中心问题”。而此中关键,还是要确保晋西北不失。他要求,紧急出动贺龙所部两三个团,与决死四纵队及续范亭部联合作战,全力巩固晋西北的战略枢纽地位。^①

对于总部就设在武乡的八路军指挥官朱德、彭德怀等人来说,晋东南是八路军重点经营的另一个战略枢纽,也是创建另一个晋察冀根据地的核心地区。因此,晋东南遭遇如此大的损失,是他们难以接受的。毛泽东12月30日的激愤情绪,其实也是朱、彭等人同样心理的反映。但是,毛泽东很快冷静了下来,朱、彭的想法却没有那么快转变过来。

彭德怀在1939年12月31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明确提出蒋、阎事实上已经转向反动,故应对晋绥军予以沉重打击,应有不惜与国民党撕破脸的准备。随即,朱、彭即部署八路军重回太南,并要求各部对那里的晋绥军还以颜色,用严厉手段予以打击。^②然而,毛泽东对此却有不同意见。他再三告诉彭德怀说:“目前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彻底消灭阎锡山旧军也是长时间事,迅速解决不可能。目前,“晋西北有贺、关率两个团去,可以保障逐渐消灭旧军化为根据地”。但晋西南情况已转为复杂,必须重新布置。一个选择是派人回去打游击;一个选择是让阎占吕梁山大部,“由贺、关与晋东南各出一部向吕梁山攻击,至少恢复原有陈支队阵地及一条交通线,打通延水关”。当然,他同意,晋东南已失之七县可选择无中央军之几县,消灭孙楚,恢复政权。^③

直到1940年1月16日,我们仍能看到毛泽东赞同朱、彭争取夺回晋东南的电文。这是因为他担心,由于八路军基本控制了晋西北之后,“阎与中央会更结合,以夺取晋东南”。因此,对晋东南国民党军的进犯不能不坚决抵抗,“否则势必丧失晋东南”。^④但几乎与此同时,他却已经在考虑分化蒋、阎关系,以重回山西以往统战局面的需要了。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此解释说:“此次山西的摩擦,阎锡山在晋西南、晋东南获得两个胜利,占去十七个县,拉走决死队两个团。我们也取得两个胜利,取得晋西北七个县的全部政权,取得新军四十一团,[我们]这两个胜利比阎大。”因此,他明确主张要立即派人与阎锡山接触,争取妥协,和平解决事变。^⑤

既然要争取与阎重建统战关系,对阎及其晋绥军的策略就必须要从武力反击,转回到协商妥协上去。因此,从1月下旬开始,毛泽东对打回吕梁山去的提议已开始表示异议,说:“反攻晋西南会使我们处于进攻者的地位,在武装摩擦中对于我们有利的是战争的局部性和防卫性,而不是战争的全面性及进攻性。”^⑥同样,对夺回晋东南各县政权的方针,他也不很赞成了。他强调认为:“晋东南是持久斗争”,“该区有建立最大根据地之前途”,但目前只宜采取“巩固现有阵地,严阵以待,来者必拒”的态度,只宜做“防御的局部战争”。^⑦他的理由是:“现在山西是八路军、阎锡山、中央军三大力量的斗争,我们的方针以保持原有力量[关系]为好。”对阎及其旧军,要使他们有些希望,不要

① 《毛、王致总部、一二〇师关于晋西事变以及我军事部署电》(1939年12月31日)。

② 《朱、杨、左致黄克诚并告彭德怀电》(1940年1月5日)、《朱、彭致聂、吕、程等电》(1940年1月5日),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研究组编著:《朱德军事活动纪事(1886—1976)》,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520—521页。

③ 《毛、王致德怀同志电》(1940年1月5日),转见黄修荣《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1931.9—1945.9)》,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92页;《毛泽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对阎锡山的方针给彭德怀的指示》(1940年1月11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30—31页。

④ 《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1940年1月16日)。

⑤ 《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关于山西问题的报告》(1940年1月18日)。

⑥ 《中央关于阎锡山继续反共情况下对山西工作的指示》(1940年1月25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22—23页。

⑦ 《中央关于阎锡山继续反共情况下对山西工作的指示》(1940年1月25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22—23页;《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0年2月10日)。

说他们是汉奸。“我们去谈判的方针是新旧军互不处罚为好”。^①他告诉朱、彭等军事将领,根据已了解到的情况,“在蒋介石的分化政策下,阎锡山可能与新军达成妥协”,故“新军也以在有利条件下仍属阎指挥,恢复合法地位为宜。我们的政策在于暂时中立阎,不使阎与国民党中央军联合对我,不使新军受国民党中央指挥”。^②

(三) 阎、共及国、共的划界谈判与妥协

1940年1月31日,毛泽东开始启动对阎锡山的“和平攻势”。他一面用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的名义致电二战区参谋长,表示愿意出面调停新旧两军冲突;一面亲自为薄一波起草致阎锡山电,表示愿意继续拥阎抗战。他紧接着又要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转告阎称:“八路军与晋绥军团结一致拥阎抗日到底,唯愿新旧两军重归于好,勿为阴谋家所算”。而“他们如不与新军妥协,他们是很危险的。”同时,他并指示山西八路军各部“到处发布”包括“拥护蒋委员长阎长官卫长官抗日到底”等统战口号,以造和平声势。^③

2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与八路军代表肖劲光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到秋林,与阎锡山会面并商谈解决冲突办法。王、肖提出了6点建议,即“(一)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二)双方停止政治攻击。(三)新军表示拥阎,不受某方改编。(四)双方互不处罚,互不侵犯。(五)今后统一于进步,实现阎之十大纲领。(六)恢复与新军的电台往来,及人员往来”。

阎锡山表示,新军属晋绥军是其愿望,目前问题已交中央,不便说话,但他相信这件事可以“自然演变,不了自了”,新军会自动归他指挥,不致受中央收编。至于恢复八路军交通线,阎亦表示不是问题。据此,中共中央明确认为可以承诺与阎“在晋西以汾(阳)离(石)公路为界,在公路以南准备停止游击战争,党的工作转入秘密状态”;“在晋东南以临(汾)屯(留)公路为界,八路及新军不向路南发展”。^④

毛泽东解释称:“此次反摩擦斗争中我们能够巩固临汾、屯留、平顺、漳河、大名之线,已算很大胜利。在此线以南,应与国民党休战,维持卫(立煌)之地位;在汾离公路以南则与阎锡山休战,维持阎之地位……这种休战现时是完全必要的。”他的基本设想是:“认真恢复我们与阎锡山的关系,寻找具体办法,建立新旧军的妥协,使新军牺盟重归阎锡山指挥。”同时,“争取使蒋、阎、卫承认,军渡、汾阳、临汾、屯留、壶关、林县、漳河、大名之线为双方作战地界,在此线以北之彼军如朱怀冰向南调,在此以南之我军向北调。我们只保留垣曲通太行山及永和通灵石两条兵站线”。“其重心之重心又在朱怀冰退出磁、武、涉三县及承认壶关、林县为我驻兵地区”。^⑤

但是,想要以汾屯公路划线问题,这时却很难实现了。

1月12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去电军令部,要求将已在晋东南之庞炳勋、范汉杰两军归其指挥,并要求划白(圭)晋(城)公路以西、同蒲路以东、长治东阳关以南归第一战区。^⑥蒋介石当即批准了卫的请求,并先后于1月17日和2月14日两令朱德将部队移至白长路以东、长(治)邯

① 《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40年2月)。

② 《毛、王致朱、彭等电》(1940年2月11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86—87页。

③ 《毛、王关于山西新旧军冲突我之工作方针问题致朱德等同志电》(1940年1月31日)、《毛泽东、王稼祥关于为新军代拟致阎锡山电稿及新军口号致朱德等同志电》(1940年2月11日)、《毛、王致王世英电》(1940年2月7、11日)、《毛、王致朱、彭电》(1940年2月14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86—87页。

④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山西十二月事变后我之基本政策的指示》(1940年3月5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88—91页。

⑤ 《毛泽东、王稼祥关于争取对内和平,巩固已得阵地的方针与基本步骤给彭德怀的指示》(1940年3月5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92—94页。

⑥ 转见《徐永昌日记》第5册,第262页。

(邯)路以北地区。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命令,朱德、彭德怀强烈反对。日军进据白晋路和长邯路后,原晋冀豫区被切为四块:白晋路以东、长邯路以北为太北区;白晋路以东、长邯路以南为太南区;白晋路以西、中条山以北为太岳区;中条山及以南为晋豫区。创建晋冀豫根据地的计划已无从实现,如果连太南区也放弃的话,太岳、晋豫两区亦难接通,八路军的主要活动区域将只剩下太北区了。故他们坚持认为:太行山南部的壶关、长治、潞城、黎城、平顺是我基本地区,我们的方针是必须巩固,并尽可能争取巩固陵川以及高平至晋城大道以西土地。对高平、阳城、晋城、陵川地区的叛军和反动政权,应寻求机会打击消灭之。对中央军虽应尽力避免冲突,但其如果进犯我军,则应给予坚决打击,争取消灭其一部。^①这一意见意味着,他们不仅对蒋令不以为然,就是对中共中央打算以汾屯公路与阎锡山划线的提议,也不很认同。

而毛泽东同样很坚持自己的意见。其3月5日给朱、彭发去长电,力劝朱、彭将前伸至晋城、陵川、高平之部队撤回到长治以北来。为此,他委婉地提出,可以争取让对方“承认壶关、林县为我驻兵地区”。他很清楚,该两县是在蒋介石命令的北撤线长治、邯郸路以南,蒋必不接受此议。因此,他实际上的意见是请朱、彭考虑:“退出壶关、林县两县”,“承认平顺、磁县为两军境界”。^②

这个时候八路军与中央军在晋东南的军事冲突已经剑在弦上。蒋于2月14日再令不见朱德回电后,于2月22日正式批准了军令部拟定的对太南区八路军实施包围,必要时“断然歼之”的作战方案。^③3月3日,蒋又以手令形式发出命令。3月12日,在仍没有收到朱德回复的情况下,蒋介石更进一步发出限期令:“严令第十八集团军所部,限本月十五日以前撤至长治、邯郸之线以北,该线上归中央军防守,如其不遵限撤去,应以违抗命令,破坏抗战之叛军论罪。”电报明令在山西的中央军,八路军过期不撤,即应“全力剿除之,勿稍犹豫,致误大局”。^④

得知蒋限期令后,彭德怀电毛,仍强硬表示对中央军的过分压迫应以防御姿态予以抵抗。毛复电再示不同意见,明确提出:“须避免在陵川、林县地域再与中央军冲突。如彼进迫,我应北退”,并告诫说:“蒋卫已下令庞炳勋、范汉杰、刘戡、陈铁各部主力集中于太南周围,并有从陇海路加调六个师渡河讯,请兄等密切注意此事之严重性”。“我们此时必须避免同中央军在该地域作大规模战斗,因此须准备让步,以便维持国共两党合作局面”。为此,“请你们考虑让出陵川、合涧、林县一线的问题”。^⑤

慎重权衡利害并考虑中央的意见后,朱、彭终于不得不痛下决心放弃长治以南地区。他们于15日一面电嘱各部:“当前应以保障离汾、临屯两条公路和平顺及漳河以北地区的巩固为主,避免扩大摩擦及继续摩擦。”^⑥一面电告蒋介石和卫立煌,说明已下令将晋东南平顺、陵川境内的八路军一律撤至平顺,将豫北辉县、林县境内的八路军各部,一律撤至漳河沿线。^⑦

^① 《朱、彭、杨致黄克诚电》(1940年1月29日),转见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研究组编著《朱德军事活动纪事(1886—1976)》,第523页。

^② 《毛泽东、王稼祥关于争取对内和平,巩固已得阵地的方针与基本步骤给彭德怀的指示》(1940年3月5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93—94页。

^③ 见《刘斐等关于鹿钟麟企图侵占陵川围歼八路军往来文电》(1940年2月19日)、《蒋介石致鹿钟麟密电》(1940年2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2),第254页。

^④ 《蒋中正致洛阳卫长官电》(1940年3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9061172。

^⑤ 《毛泽东复彭德怀电》(1940年3月13日)、《毛、王关于必须避免同中央军作大规模战斗致朱、彭并告贺关、刘邓、左黄、陈罗电》(1940年3月15日)、《毛、王关于请考虑让出陵川、合涧、林县一线致朱、彭电》(1940年3月15日)。

^⑥ 《朱、彭、杨致电左、黄、杨、程、宋、刘、邓等电》(1940年3月15日),转见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研究组编著《朱德军事活动纪事(1886—1976)》,第532页。

^⑦ 《朱彭致重庆蒋委员长电》(1940年3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2),第243页。

自3月15日起,晋东南八路军在长邯路以南的部队,陆续开始北撤,地方党政机构和群众组织骨干亦被迫随军全部北迁。^① 据统计,此次北撤八路军主力部队1.2万人,太南特委及所属17个县的党员约5000余人,牺盟会等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卫生队等约1万余人。^②

结 语

表面上看,此次事变中中共遭受了很大损失,但阎锡山方面一样没能占到便宜。晋东北原本就在八路军的控制下,这回又失去了晋西北和晋东南,阎锡山事实上只是收获了对晋西南的控制权和少部分的新军。

值得注意的是,出于“不使阎与国民党中央军联合对我”的考量,毛泽东曾极力反对把决死队编入八路军,主张牺盟会和决死队都应有条件地交归阎锡山指挥。^③ 3月14日,他甚至就新军问题发出长电,全面说明了自己的意见和理由。^④ 但是,他的这一主张却受到朱、彭及北方局领导人的反对。^⑤ 毛此后也没有再坚持己见,因为事实上他所担心的情况也并未出现。如此一来,自抗战开始以来山西阎主共客的关系,也就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共产党八路军在山西的行动,明显地不需要像过去那样,太多地考虑阎锡山及其旧派的感觉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时面对日本和国民党两个强大对手的情况下,相信自身力量还十分弱小的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是十分看重与中间势力阎锡山的统战关系的。即使到了1940年初,中共武装力量已经从抗战初的两三万人,猛增到22万人^⑥,毛泽东等人也依旧相信对阎锡山统战的重要性,生怕把阎逼到国民党中央一边去。换言之,至少中共中央在此期间从未有计划地想要搞垮阎锡山,更不曾主动想去破裂与阎锡山的统战关系。中共在山西的统战政策所以会摇来摆去,阎、共之间所以会接二连三地出现摩擦与冲突,乃至走到破裂,本质上固然是利益之争的结果,其间却也存在着诸多不依双方政策设计者的愿望为转移的复杂因素的作用。

当然,从另一个侧面亦可看出,所谓“山西王”的阎锡山对山西的控制力其实是有限的。他能够成就近20年“山西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未真正受到过外部力量介入的有力挑战。不论他有怎样的先见之明,并敢于从事何种大胆的变革,他到底还是离不开旧有的政治统治秩序与社会关系基础。当他在对日战争中丢掉了其赖以统治山西的各主要的城市,不得不退入农村,与合法进入山西农村的中共及其武装展开竞争的情况下,他在山西的统治也就很难继续下去了。

〔作者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高士华)

^① 实际撤军界线似应在津河以南的林县姚村以北和平顺、壶关以南的大井至郭家坨一线,即河南林县北部到平顺、壶关一带。参见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1937—1949)》,第114页注16。

^② 参见焦书文《华北抗日斗争史上的重要一笔——太南撤军》,《党史文汇》2002年第5期。

^③ 《毛、王致朱、彭等电》(1940年2月11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86—87页;《毛、王致贺、关、林、赵并告朱、彭、杨电》(1940年2月24日)。

^④ 《泽东、稼祥致贺关、赵林并告朱、彭、杨、傅、陆电》(1940年3月14日)。

^⑤ 《朱、彭、杨致朱、彭、贺、关、向应并报中央电》(1940年3月16日),参见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研究组编著《朱德军事活动纪事(1886—1976)》,第532页,等。

^⑥ 见《中央书记处关于朱德同志与卫立煌谈判各点致朱、彭、杨电》(1940年3月28日)。

The Journal of Studies of China'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No. 1, 2015

Preamble *Gao Shihua* (3)

Struggles between Yan Xisha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ural Areas of Shanxi Province—Focusing on the Change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in Southeast Shanxi before and after the Outbreak of China'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 *Yang Kuisong* (4)

Both Yan Xishan and the CCP paid high attention to rural problem. Yan independently controlled and administered Shanxi for twenty years long. This perhaps had relations with his care of the problem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However, Yan's rule was still built on basis of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tructure. Therefore,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defense the Communist movement factually was to prohibit the CCP to carry out public and legal activities in Shanxi.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broke out, the CCP entered by both public and secret ways into Shanxi, and got involved publically and legally in works of mass mobilization, mass organization and mass militarization. This naturally resulted in conflicts and confrontations between the CCP and the traditional old forces. From any angle, the CCP needed to win over Yan Xishan to maintain a neutral position between the new and the old forces, including in the Guomindang and the CCP relations. Therefore, the CCP did not actively and initiatively take any actions to destroy the policy of keeping the united front relations with Yan, but tried more than once to repair the relations between two sides. However, because their ideas and viewpoints, and experiences and feelings were different, because the understandings of the personnel of both sides at different levels to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were different, in particular because the starting points for both sides to cooperate were different,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of maximizing their own interest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in the end moved to rupture.

A Study of Grain Problem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Huang Zhenglin* (40)

Though the environment of grain production of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located in the Loess Plateau is not very good, the CCP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Border Region, in order to bridge over the most difficult period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made great endeavors to increase grain production and grain supplies: (1) They widely mobilized peasants and organized labor force to increase grain output through reclaiming wasteland and enlarging farmland; (2) They regulated and adjusted the system of grain administration and supply, and to the maximum extent saved grain to ensure grain supply; (3) They prohibited exporting of grain from the Region and usage of grain to make alcohol, with the aim of decreasing grain consumption. All of these measures obtained a good achievement. Firstly, the cultivated area and grain output in the Region were greatly increased. Secondly, the problem of competing for food with peasants was resolved through adjust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and through building more reasonable grain system to lighten the burden on peasants. The successful solution of grain problem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for the Region to bridge over the most difficult period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refore, the factor of grain production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in discussing on the problem of self-sufficiency of the Region.

Portrait Politics: The Portrai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Leaders in Festivals, 1937 – 1949 *Li Junquan* (71)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the portraits of leaders with internal political